

#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09 年

**田纪云谈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



## 目 录

### 特稿

- 1 田纪云谈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 .....杜明明 徐庆全
- 7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  
—— 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 .....冯兰瑞

### 求实篇

- 11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 .....郭德宏
- 18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杨继绳
- 24 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 .....林蕴晖

### 人物志

- 29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 (整理)
- 37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丁龙嘉
- 44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 .....方小宁

### 沉思录

- 47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彭 迪 钱 行
- 52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 .....周瑞金
- 58 再说“孙大午案” .....王建勋

### 往事录

- 66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李海文
- 71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钱 江

### 一家言

- 76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 (外一篇) .....邵燕祥
- 78 “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张绪山

### 怀人篇

- 81 我的老师陈白尘 .....董 健
- 84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 .....易 非

### 海外事

- 86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 .....资中筠

### 顾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杜 光  
杜导正 (召集人) 杨天石 杨继绳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 (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 社 委：

杜导正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 行 部 邮 箱：[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 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 田纪云谈 1992 年中央党校讲话

● 本刊记者 杜明明 徐庆全

田纪云是“土八路”出身的“红小鬼”，八十年一路走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无大专文凭，也无政治背景，做梦也未曾想过能够涉足中南海，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推进了中南海，并且竟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田纪云 1981 年调进中南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此前，他在四川省财政局任局长；此后，他很快“上升到高层”：1982 年为中央委员，198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再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对自己何以能“平步青云”，田纪云有两个解释，一是“时代的大潮”，一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性格”：“我能吃苦，有悟性，肯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所云“时代的大潮”者，即改革开放的国家背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开启了中国改革的航船前后，面对十年“文革”经济凋敝的状况，一些省份已经自发地开始探寻让人民吃饱饭的“自由主义政策”了。譬如，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委，就自主地推行被毛思想体系下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包产到户政策；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委，也探寻农村多种经营的灵活政策——“水路不通走旱路”，又开始酝酿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此外还有周惠任职的内蒙古、任仲夷任职的辽宁、宋平任职的甘肃等，也有种种举措。这些涌动的暗潮，与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国策融为一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由此波涛汹涌。

“时代的大潮”，是需要改革者并创造改革者的时代。在中央，率先为改革破冰的胡耀邦，已就任总书记；在地方，留下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民间口碑后，两人前后走进了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田纪云，也便成为“时代大潮”所需要的改革者中间的一位。

在三中全会前后四川省委的改革探索中，田纪云在经济改革重要部门之一的财政局任职。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要改革，就必然会涉及到财政管理体制这个“牛鼻子”。田纪云主动牵“牛鼻子”，他用“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的论断，为省委的改革“快牛扬鞭”。

走进中南海，田纪云仍然“不需扬鞭自奋蹄”。1989 年后至 1991 年底，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保守者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否定农村改革；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再次拨正航向。4 月 25 日，田纪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虽然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但主要是阐发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一位公开站出来表态的中央高层领导，其影响之大，竟至于那个五一节假，很多人以聚在一起或听或观其录音或录像为快意！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30 年的历程，作为改革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的田纪云，出版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书，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存照。

承载着 1992 年的记忆，我们拿到书后，最先





田纪云近照

阅读的还是他这篇在 1992 年振聋发聩的讲话，并对田纪云何以要作这样的讲话产生了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田纪云同志。

## 对话田纪云

记者 田老，祝贺您的新书出版。这本书汇集了您的文章、讲话和演说，可以说，是追溯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索引”。尤其是您 1992 年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更是记录了 1992 年前后那段历史。当年我们就读过有关的报道内容，也听说过，很多人都到处找您讲话的录音或录像来听或看。现在重温后我们发现，尽管已经过去了 16 年，这篇讲话的观点、看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来拜访您，就是想了解一下这篇讲话的有关情况。

田纪云：你们还年轻嘛，16 年前就更年轻了，也关注我的讲话？先把你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有关这个讲话的反映说来听听。

记者：我们带来了一份 1992 年的《星岛日

报》。这份报纸这样写道：“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到南，到处巡视、发表讲话，积极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做注脚。四月底，田纪云经一番转徙南北后，返到北京，作了一次重要的、纲领性的谈话。他对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大谈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向。他批判干部终身制和集权制度，指出：放权搞活、守权搞死；他抨击苏式（即列宁、史太林模式）社会主义导致东欧变色；他认为奉行高度集中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把经济搞上去！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亦谈到在新形势下，国务院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准备采取的措施，大力反“左”，和必须冲破的禁区。”

田纪云 这份报纸所说的，大致还是事实。所谓的“从北到南”，是 1992 年的 3 月到 4 月，我先后在山西、国家经贸部，然后到广州、深圳，敞开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体会，用意当然是推动人们紧紧跟上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一定要思想解放。回到北京后才到中央党校作了那篇讲话。

记者 我们从您的书中，以及有关材料中，也查到了您“从北到南”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您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您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

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田纪云:其实,回到北京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意思都体现在我从南到北的讲话中了。只不过是,由于从南到北的讲话,是到一个地方讲一个地方,比较分散,而且又是在外地,引起的反响没有在北京那样集中而已。

记者:是的。您在中央党校讲话后,人们纷纷找录音或录像来听来看。有个当年看你的录像的朋友跟我们说,他当时真有“雪夜无人读禁书”的紧张和期待。为什么紧张?是为你担心,因为虽说小平南方谈话稳住了大局,可是那时候“左”的势力明枪暗箭,是很厉害的,会不会找别的什么问题报复你呢?为什么期待,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总该有领导人快一点公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呼应才是。

田纪云:当年的形势是紧张的,不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重新拨正了改革的航向后,这是历史的主流。我从进入中央工作后,一直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从来没有动摇过。

记者:我们现在可以谈笑风生地说历史,但回想起来 1989 年至 1991 年年底的形势,还是紧张得不得了。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对改革开放国策的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后,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严重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

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那时候,可以说,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名义,否定农村改革的伟大成果;二是,以“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全面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

田纪云:是啊,有了这股力量,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有争论。小平同志之所以以这样的高龄到南方,就是要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果,回击这股力量。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说明,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反对改革开放的都大有人在啊。

记者:就拿你在中央党校讲话后的反映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新闻界一位姓杜的老领导,就几次对我们谈过:当时他费尽周折找到你的讲话录音后,听了几遍,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篇犀利的反“左”檄文,应当立刻广泛流传。为此,他托人复制了好多盘磁带,分送给他的担任省部级领导的朋友。结果,得到的反映也针锋相对:有的人,也如同这位老领导一样,非常



1986 年 12 月 24 日,田纪云(前排左二)在湖南长沙参观岳麓书院

高兴；但也有的人，却因此与这位老领导断了往来——观点不同，也许是怕摘了官帽，连朋友也不敢做了。您说多有意思。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在看你的录像时，担心你遭到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

田纪云：当年交锋虽然很激烈，但我从来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啊。我前面说过，我在地方，在中央，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共产党员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就是下台嘛。

记者：在你的书中，我们看到了1993年您卸任国务院工作后的答记者问。当记者问“你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您的回答是：“我最基本的体会是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您还说：“十多年来，我不能说我在一切工作中都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我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这就是您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吧。

田纪云：其实，在当年的争论中，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坚持改革开放的力量还是强大的，主流的。我在中央党校讲话后，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另外，我把这个讲话通过小平同志的女儿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

记者：说到为坚持实事求是“不怕丢官”这一条，我们对您是敬佩的。从您在1989年10月一个讲话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您始终是坚持这一条的。而且，若从这个讲话来梳理，您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也不是偶然的。

田纪云：你们说的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那篇讲话吧？那是我在讨论为1989年8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所做的一个发言。

记者：那时，那场“六四”风波刚刚过去，质疑改革的声音渐起，对上一届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央的工作如何评价，等等问题，都冒出来了。您的发言，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您说：“十

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田纪云：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

记者：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您是否也遇到了压力？

田纪云：有压力。有人就攻击我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这个“恐合症”，是说我恐惧“农业合作化”。不过，在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记者：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小平同志是非常赞赏的。他在南方谈话中特意说道：“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田纪云:改革开放30年后回头看,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依然占有重要一页。

记者:由此说来,从十三届五中全会到十三届八中全会,您的两个发言,再到1992年你在党校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田纪云:是的,我说过,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当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回头看,还是我1993年答记者问的话。那天,当记者问到我这十多年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担负了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时,我回答说:“回顾十多年的工作,我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显赫的政绩,值得骄傲,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无所建树。我为国家十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一份辛劳。回首我在中南海的十多年,我的心情是坦荡愉快的,我为国家和人民是尽心尽力的。”今天我们谈到的1992年党校讲话,或者再往前追溯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我的两个发言,也算是“我的一份辛劳”吧。

## 重温田纪云党校讲话

在与田纪云对话后,我们本来想就党校讲话的内容再多谈一点。但田老说,讲话的内容已在书中了。讲话的内容你们自己去解读吧。

其实,在采访他之前,我们已经细读了讲话,不时地为其毫无顾忌的话语而喝彩。这篇讲话,从题目《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上看,似乎是专讲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其实不然。讲话虽然是从农业和农村问题入手,实际上是为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

第一,在谈到农业和农村问题时,田纪云指出,必须贯彻三个坚定不移,主要是要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

##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田纪云 著



第二,阐发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思想,将当年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想具体化,进行坚决的批判。他在讲话中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还必须打破“左”的禁锢和束缚,不把“左”的问题具体化,搞清楚,光说加快改革开放,是加不快的。一句话,阻力重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东西,领导层如不认真清理“左”的东西,不在理论和实践上认真领会小平的讲话精神,认真解除“左”的思想束缚,很难创新,很难做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左”的束缚非常严重,你如果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他就没有想想这个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不是改革开放来的吗?宣传改革开放就破坏大好形势,这不是颠倒是非吗?你如果说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说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和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

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有企业,个体户,他就说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说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部都否定了。

在总结了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论者的主要观点后,他说,“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比比皆是,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里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是空谈。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

第三,对于当年盛行的借“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国策的观点和做法,田纪云以近乎于浅显的道理予以坚决回击。他指出: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些沿海地区、边境地区的人往外跑,为了阻止外逃,什么措施都采用了。但还是堵不住。现在那些措施都没有用,而想回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这边比他们那边还好些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离开物质这一基础,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人民生活的改善,整天领着大家去唱“社会主义好”,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巩固不了的。“文革”时不是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吗?心里真觉得很好吗?未必。后面加上“就是好,就是好”,强词夺理嘛!怎么好呀,我们想想那个时候怎么好呀?我长时期搞财贸工作,没有为多而发愁,都是为少而发愁,什么都少。逢年过节都要考虑怎么为大家搞点肉,搞点豆制品、黄花木耳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凭票的。豆制品还要粮票的。一个人一个月三两肉,北京是首都半斤肉,一个人每月一斤蛋,大部分还是臭蛋。一到周末就要与老婆商量,肉票还有多少,这周吃了下周还有多少,早上起来不干别的,先去排队。见队就排,与苏联现在差不多。排上之后才看卖什么,一看不合适再排另外一个去。我那

时虽然也是厅长,早上起来照样和老婆一起去排队买吃的。

为此,他认为,如果真要“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反不了,相反,“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

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论者,所持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对此,田纪云有这样的回答:

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顷刻间就垮台了吗?这说明,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给社会主义注入生机和活力,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做到的。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最根本的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使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田纪云的结论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人民能不爱吗?一个领导这样国家前进的党,人民能不拥护么?”

言外之意自然是:那些“反和平演变”论者,实际上是把国家、把党推向灾难!

上述摘录,仅仅是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如果通读全篇,相信也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与一些干部讲话的“入股”腔相对照,田纪云直抒胸臆的“话风”,也可以说很不錯了。

因为讲话是那样的直抒胸臆,听者胸中块垒也随之一吐而出。所以,讲话才能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所以,在时过16年之后,我们还依然有理由来引述它,宣传它。

(责任编辑 杜 晋)



# 精神文明决议 擦肩而过的遗憾

## ——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

● 冯兰瑞

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耀邦同志直接主持起草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他的前瞻性的思想火花。记得在文件发布约两个月后,我曾在中国经团联全国秘书长会议上讲过十点学习心得体会。那时候的理解比较肤浅,值得现在重新解读。

《决议》是在198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这是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能作出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唯一的重要决议。《决议》中有不少新提法新观点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大家看了都十分振奋,认为在“邓胡赵”体制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决议》的路子走下去,我国实现现代化中兴伟业的成功可以预期。

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中华民族竟然又一次与现代政治文明擦肩而过。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

### 突出政治体制改革

《决议》首先肯定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这里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三个方面并列,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如此安排不同一

般,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一般说,与经济体制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与物质文明对应的是精神文明。这是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政治体制本可包含在广义的精神文明中,属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决议》把它独立出来作为与精神文明建设平列的一个方面,其中大有深意。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年里,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乡经济获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相形之下,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却还是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中,没有什么具体措施,相反在实践中还不断违反民主原则,不断开展批判不同意见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十年“文革”造成社会沉渣泛起,道德败坏,人文精神失落,世风不振,形形色色的遗毒尚未尽除。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矛盾丛生,弊病百出,阻碍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理论界、文化教育界、社会各方舆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决心起草一个纲领性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他不仅亲自主持、直接领导、参加讨论,并且还自己动手改了一稿。《决议》之将政治体制改革突出地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一个重大方面,正是对国内外同志意见的广泛反映,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获得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本来是全面改革的方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改革。但在此后的五年间，我们只抓紧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所以，《决议》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阐述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时宣称：“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这个决策是多么地激动人心！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决议》通过之后不过三个半月，耀邦同志就被迫辞职。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提上日程，却旋即因“八九风波”而停滞。

## 根本任务是培养公民

在新世纪全球化时代，我国有觉悟的知识分

子认识到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大声疾呼要加强公民教育，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甚至想要当公民教员。这，表明了我国社会正在进步。

二十年前，就我个人来说，不仅对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缺少认识，自己的公民意识也是很差的。说来惭愧！在重读当年的《决议》，看到其中将培养公民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仿佛是个新发现。

《决议》第二个问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提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强调：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条件。

“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决议》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提法，与十二大报告中培养“四有劳动者”有明显的连续性。即令是文字上，本次《决议》同十二大报告中的若干提法也是很接近的。例如：“加强宪法和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道德的教育”，“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公民义务、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等。

其实这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提出的对公民的要求，已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之内，是建设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已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却很少涉及民主宪政建设问题。其中的制约因素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是我国目前政治格局下不可动摇的铁律。《决议》在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要遵守宪法的时候谈到了党员，也只能含糊过去。例如说“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这当然是对的。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中的两个字：“都”和“还”，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党员也是公民，也要遵守宪法，不仅要遵守宪法，还要遵



守党章吗？后面接着说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人物，也是指党员和党政官员的。但是却到此为止了。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就按照《决议》的要求开始抓公民教育，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政治文明，那么，今天中国公民的素质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然而，逝水东去，不复西流！历史是不能后悔的。现在重温《决议》，写下这些，既是缅怀耀邦同志，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 精神文明建设与对外开放

《决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中谈到对外开放时，写了这么一段话：“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我们……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又说：“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着重点在于必须把世界各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

自从1978年底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就已开始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小平同志说每年要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都是去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科学的。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问题，《决议》一再强调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主要强调的实际上是接受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也就是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否则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

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没有停留在抽象的肯定对外开放国策也适用于精神文明的表述上，而是具体化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决议》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决议》在第五个问题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个观点在整个《决议》中最具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它一反我们党长期以来对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理念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胸襟，正面肯定和赞扬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又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从这里引申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这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条我国主要历史教训，第一条已开始改正，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条——建设民主政治——却至今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取得多少进步。

相反的情况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仍然常常拒绝接受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把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现代人文知识在内的现代政治文化仍视为反动、腐朽而加以排斥和打压。且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宣部一位处长秦川在起草的文件中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还是不容许有自由、民主观念。这在中国共产党并非偶然，而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

自从1938年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自由”属于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观念。1950年代苏共有人批评中国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刘



1989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少奇曾辩解说，我们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词竟然“为我所用”，成为打人的棍子。自1980年代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浪接一浪，对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任何讨论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进去了就可以批判。

在此政治环境下，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概念正名，肯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先进潮流，是要有勇气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决议》，也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

《决议》全篇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的思想，却没有一处讲到宪法要实施，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宪政建设。

《决议》中关于培育公民的要求对于形成现代公民社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明确提出宪法的作用是维护公民权利、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只要求党员遵纪守法，没有提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什么原因呢？是反映了当年我们党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抑或是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据说，《决议》起草过程中曾广泛征求意见，征求的对象党内大约有两千人，党外也有几百人，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好像没有人对培育现代公民、对宪法的实施和宪政

建设提出问题和意见。

至于《决议》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更是为求得文件通过而作出的妥协。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写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是不行的，征求意见时有人反对也不许可。讨论时陆定一就坚持反对写上“反

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决议》保留了那段话，对于耀邦来说，也是一种无奈！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识分子，竟会成党的总书记被非法围攻、逼迫辞职的一大罪状！

耀邦同志被迫辞职，“邓胡赵”体制解体，耀邦同志去世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缓、贻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实现政治民主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铸成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遗憾。

重读二十年前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决议》，我认为即使其中有上述的不足之处，有许多不得不然的必要妥协，仍然使我再次深刻感受到耀邦同志思想的光辉！在那样严峻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公民教育，主张精神文明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勇敢地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坚决摒弃了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法，所有这些都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更加符合实际。

我们今天怀念耀邦同志，完全有必要重新解读认真思考二十年前由他主持起草、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深刻认识其主要思想对当今中国政治走向具有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杜 晋)

#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

● 郭德宏

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对民主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很多论著对他的民主思想评价甚高。然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且给全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很多误区和局限。下面,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分析,并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 “民”:全体还是多数?

研究民主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民”的含义,即它是指什么人或哪些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全体公民,即一国之内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第二种是指人民,即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第三种是指与“官”相对的一般群众。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解释,民主之“民”所指的应该是第一种含义,即凡是公民,不管宗教信仰,不管民族归属,都同样享有民主权利。一如伏尔泰所说“天赋人权”,在人类社会,不存在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正当性。即使是第二种或第三种含义,也应该是指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毛泽东以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正因为他有这种理解,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曾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的讨论。在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出“民主化”。张闻天立即表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

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sup>注1</sup>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sup>注2</sup>。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sup>注3</sup>,并且提出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sup>注4</sup>。但是,在他随后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却把“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从四个方面的内容变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sup>注5</sup>三个方面。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修改,有的人很不理解,但有的学者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所以,他认为有了“大众的”说法,就可以不要“民主的”说法。他这里说的“大众的”,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的意思,即“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sup>注6</sup>,主要是工农兵,并不包括其他的阶级、阶层。其实,这是毛泽东对民主的一种误解,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了,而没有把民主看作全体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他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更是不应该的。后来可能是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妥,所以在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时,又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这句话的后面,加了“即是民主的”<sup>注7</sup>几个字。<sup>注8</sup>但我认为,即使加上了这句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图为大会会场外景

话，仍不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更全面，更科学，因为“大众的”主要讲的是文化的服务对象和普及问题，与“民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要科学，不要民主，确实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缺陷。<sup>注9</sup>

民主有一个重要含义，即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由于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就忽视了少数人的权利，使他们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如果仍然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那就必然忽视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就不能实现全体公民的民主。

## 民主：目的还是手段？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有的认为民主是目的，有的认为民主是手段，莫衷一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对于建立民主制度来说，它应该是目的。从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个层面来说，它又是手段。

对于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毛泽东都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多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sup>注10</sup>的专政目标，并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政体。后来他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

这都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说的。但是，他更多地是将民主看成手段和方法。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sup>注11</sup>他还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sup>注12</sup>

由于毛泽东更多地是把民主看作手段和方法，所以他在关于民主的论述中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态度、民主作风。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问题时说：“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sup>注13</sup>所谓军事民主，就是“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都应该“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sup>注14</sup>。这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平等的民主关系。关于民主作风，毛泽东就讲得更多了。例如共产党员要“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

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sup>注 15</sup> ;“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sup>注 16</sup> ;“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sup>注 17</sup> ,等等。

即使作为根本制度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那里,也更多地是作为手段和方法来讲的。例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sup>注 18</sup>。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sup>注 19</sup>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次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sup>注 20</sup> 关于民主集中制,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sup>注 21</sup>。所以,“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sup>注 22</sup>。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和方法。

由于毛泽东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就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使它变得可有可无,从而忽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从理论上说,目的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易性,手段则具有多样性和可易性,如果将民主只是作为诸多手段和方法的一种,那就可以采用,也可以不用,可以改变,也可以抛弃,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所以,毛泽东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虽然多次说过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得多的民主,并在宪法中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做了一些规定,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 制度:是民主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

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sup>注 23</sup>。此后,他就一直强调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并说:“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sup>注 24</sup> 这看起来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个理论和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即它的实质在于集中,民主不过是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

其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社会,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后来列宁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起初只提集中制)。十月革命后又把这种制度扩大为苏维埃国家体制的指导原则,甚至还把它列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加入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理论,重大问题虽然要由集体进行充分讨论,而且讨论自由,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发表,但其重点和目的都在于集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了这个理论,并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以至全社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是必须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实行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只能妨碍民主的实行和进步。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是被虚化的,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既然是手段,就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完全由领导人的意愿所决定。因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是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于各级党委,在各级党委中,集中于第一书记;最后,全国的大权都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而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主权利,都少得可怜,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扩大民主”、“让人讲话”的号召,甚至把话说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严重程度。

过分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的专断和专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有的人记录为毛泽东提出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了秦始皇极权专制式的集中，哪里还有什么民主？还有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正如杜光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就成了走向极权专制的捷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进党内民主的拦路虎、挡箭牌，要实现党内民主化，把党建设成为民主的政党，就必须取消民主集中制”<sup>注25</sup>。我认为他讲得是很对的，应该回到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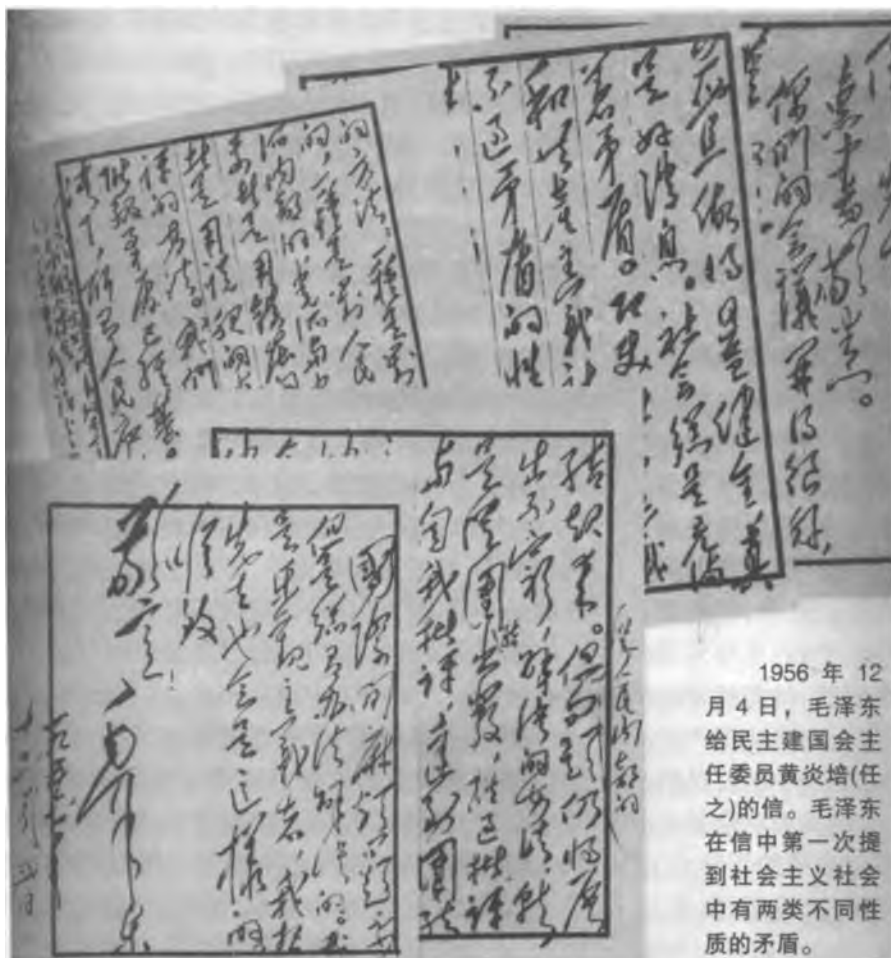
## 途径：是“由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由民做主，公民无须通过自身以外的主体而自由地表达意愿，并且直接行使权利；为民做主，

则是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代替公民表达意愿，而且代替公民行使权利。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人民民主即“由民做主”是一条重要原则。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sup>注26</sup>。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sup>注27</sup>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却把人民民主变成了他在“为民做主”。

在20世纪40年代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时说的那段名言中，毛泽东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sup>注28</sup>1944年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任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sup>注29</sup>。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的说法，他以后讲得非常多。对于他40年代的那段名言和让人说话的说法，向来评价很高，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领会，即那都是他“让”人民进行的。一个“让”字，说明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自以为是代表了人民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就是人民民主。但既然可以“让”，也可以随时“不让”，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由民做主。



正因为是由他为民做主,所以“人民”的范围是由他决定和区分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当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如何变化,除敌对分子以外的一切公民,都应该属于人民的范围。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阶级、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排除出了人民之外。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右派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百分之五的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很多人今天是“人民”,明天却忽然成了“敌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所以,毛泽东虽然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但人民的范围却越来越小。

民主本来是和法治密切连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把民主制度固定下来,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但毛泽东并不喜欢法治,而是喜欢人治。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sup>注30</sup>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不要法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领导人为民做主。

为民做主实际上潜藏了一个前提:即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能够完全了解并代表全体公民或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然而在理论上,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在实践中,这个前提存在极大的风险。人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恰恰是主体的意愿与公民的意愿并不重叠,相反,常常发生龃龉甚至抵牾。也就是说,为民做主的主体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所以,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实际上却脱离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不仅如此,为民做主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专制独裁。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作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于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分不开的。

## 方法: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

“大民主”并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针对我国现实生活里,“大民主”(公民参政议政、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新闻自由等等)太少而“小民主”(调资、升级、分房等纷争)太多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议应该多实行“大民主”。起初,毛泽东并不认同“大民主”的说法,断定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搞什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主张。他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上就曾说过“现在一些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十八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sup>注 31</sup>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借用了“大民主”这个概念，接过了这种说法，但他曲解了“大民主”提出者的原意。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赋予了“大民主”以“大批判”的内涵和“四大”的形式，开始主张实行“大民主”，并说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的方式。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提纲中指出：“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并“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sup>注 32</sup>这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在他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认为它真正发扬了民主，使广大群众得到了民主的权利。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是他民主思想的重大失误。我认为，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确实使很多人得到了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揭发、批判别人的权利，也确实可以揭发出一些问题，给那些贪赃枉法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有所收敛，但是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不管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都不符合民主的本义，是对民主含义的偏离；二是毛泽东提倡的“四大”并不是所有人的“四大”，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很多人发表的言

论，他就是坚决反对的，很多人甚至由此被划为“右派”，受到残酷的打击，只有在他号召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四大”，他才认为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由此可见，这种“四大”只是符合领导人意愿的一部分人的“四大”，而且是只许一种声音、一花独放的政治批判手段，因而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并不是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民主；三是由于“四大”不受法律的约束，容易造成无政府状态，使那些造谣诬陷别人的人得逞，使好人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提倡大民主确实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大误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非但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创伤和沉重的教训。<sup>注 33</sup>

## 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什么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毛泽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说明，只说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旧式民主完全不同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的民主。由于他过分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把资产阶级民主的很多内容都废除了。

那么，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初期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做出了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民主“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sup>注 34</sup>；“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sup>注 35</sup>，包括“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sup>注 36</sup>。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sup>注 37</sup>，它“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

埃同样一文不值”<sup>注 38</sup>。我认为,陈独秀的分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个方面,毛泽东远远不如陈独秀。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应该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要

注 1 《中国革命根据地记事》,第 298 页。

注 2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2—253 页。

注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 页。

注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 页。

注 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6 页。

注 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8 页。

注 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8 页。

注 8 方敏认为这个修改可能是在 1942 年春完成的,在解放社第三版上可能已经修改,但至今没有看到这个版本。现在看到有这句话的最早的版本,是 1943 年 10 月的解放社第 4 版。见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

注 9 我在《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否重视民主的不同意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及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分别见由我主编的《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近代中国与文物》2008 年第 2 期,《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注 10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75 页。

注 11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8—209 页。

注 12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注 13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9 页。

注 14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0 页。

注 15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2—743 页。

注 16 《记者头脑要冷静》,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3—444 页。

注 17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 年 6 月 1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6 页。

注 18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6 页。

求。否则,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 19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 页。

注 20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1—212 页。

注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 页。

注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 页。

注 2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7 页。

注 24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57 页。

注 25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一封信》,“改造与建设——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bjsj.s.net) 2004 年 2 月 18 日。

注 2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3 页。

注 27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6 页。

注 28 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 1945 年版。

注 29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2—243 页。

注 30 即马锡五(1899—1962),陕西保安(今志丹)人。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后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因在办案中形成深入调查、合理调解、就地解决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誉为“马青天”——引者注。

注 31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注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92 页。

注 33 赵东斌:《毛泽东主观中的一些误区》,《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 年第 2 期。

注 34 《上诉状》,1933 年 6 月 15 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6 页。

注 35 《给西流的信》,1940 年 9 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53—554、554、555 页。

注 36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54 页。

注 37 《给西流的信》,1940 年 9 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54 页。

注 38 《我的根本意见》,1940 年 11 月 28 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0 页。



# 价格改革 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 杨继绳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新华社1980年2月3日《内部参考》现摘引其中部分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国家确定的产品价格使得印染厂的利润率比纺纱厂高得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

国国营工业平均利润率为24%，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样是机械工业，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而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9%。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使价格不能成为经济比较和经济核算的工具，挫伤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二、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例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是目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原因之一。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展。当前利润留成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苦乐不均。……

##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现在价格管理过于集中，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品的企业丝毫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整个价格管理体系是主观的，僵死的。

在这种集中体制下，确定或改变一种商品的价格，程序复杂，周期很长。工厂试制出一种新产品，提出成本资料和出厂价意见，先报工、商两家公司协商，再报工、商两个局协商，还要报市物价局或中央工、商两部批准。经常是新产品试制出来了，价格几个月批不下来，致使企业无法安排生产。天津的小学生作业本、圆珠笔等商品的价格五六个月批不下来，学生要开学了，也无法安排生产。

价格管理过死，使商品的价格不能随着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使价格和价值偏离过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价值必然降低。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3倍，化学工业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业只提高了12%，但是它们的价格还保持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状况。有些商品,如化纺织物、尼龙袜、电子产品等,这些年发展很快,价值量已经大大下降,而价格一直不变,致使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家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价格统得过死,商品的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天津东风手表过去供不应求时,每只120元,现在市场滞销,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后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用不变的计划价格,来应付变动的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哪有不扭曲的?当然,价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反市场政策造成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所以,那时的价格改革,仅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当时叫“理顺价格”。所谓理顺价格,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官员相信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理顺”价格的。调价,主要是提高价格,比价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调低的,只能把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从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调整价格。

1979年春夏,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8.3%。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1978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当时出

现了一个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理顺”价格,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哪一个超人能够把握千百种商品价格的瞬时变化,并且“理顺”它呢?各种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是能够靠计划机关来“理顺”的,而是在价格放开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形成的。

## 双轨价:是桥梁,也是泥淖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然而,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有前车可鉴:

1948年,联邦德国放开物价,一个月之内食品价格涨了两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价格上涨,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罢工,总统盖莱克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价格就大幅度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包括,在完成

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 20% 的范围内浮动。1985 年 1 月,国务院又发出 17 号文件,干脆把 20% 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 年初,我采访冶金部得知,全国 33 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 1984 年到 1987 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 124.6 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 1000 多万吨钢。而那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 1000 多万吨钢。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用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一。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尽管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说过“双轨制是平稳过渡的桥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成了难以忍受的肮脏泥淖。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合同不能兑现;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了,到 1988 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989 年 3 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 149%,原油 213%,钢材 105%,木材

112%,铜 150%,铝 124%。

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份就越高。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 200 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 200 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 4 次,4 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 700 元加到 1600 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市场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藪,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 1988 年:价格闯关失败

1988 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 月 25 日到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 1988 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 4 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 4 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 4 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 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 31.7%。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 10 元,其它



城市补贴少一些。

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作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当时政府曾设想,逐步形成工资补贴和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挂钩的办法。后来由于消费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无法控制,如果采用工资和价格挂钩的办法,就会形成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停止了这种办法。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以后,茅台酒的零售价由20多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群众开始产生恐慌。

在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份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上看,物价上涨势头已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从经济本身看,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

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一个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储户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九三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仅仅动用了300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 治理整顿:使经济萧条,也为“并轨”创造了条件

改革期间的通货膨胀和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关系的。当时称之为“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是靠增加投资来支撑的。增加投资又是靠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缩。

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一次经济收缩,通过

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1988年压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为17.8%,1990年为2.1%,1991年为2.9%。为抑制通货膨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2%。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顿,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双轨价”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已经大大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格的现象。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会有多大的冲击了。

## 1992年:价格全面放开

过去几年的价格改革,凡是供求关系不是很紧张的商品,基本都放开了。而供不应求的商品(称为短线商品),还是由国家控制。结果是,价格放开的商品发展得快,国家控制的商品发展得慢。这就是人们说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这些供求紧张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这是因为加工业的发展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发展。1992年,不仅供求关系宽松了,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这要归功于邓小

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因此,从1987年以来进入困境的价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现在,人们认为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

放开,放开,放开。1992年也许是价格放开最多的一年。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得最多。到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它工业品价格也大踏步地放开。1991年底,国家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有60种,1992年就放开了5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都全部放开了。1993年,钢铁产品价格和大多数机械产品价格实现了价格并轨。1994年陆上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也实现了价格并轨。

最惊险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

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长期以来,国营粮店对城镇职工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国家从农民那里的收购价格。差额由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这是将近一年的口粮。理论界早就算出了这一笔账,建议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过去一直把粮食价格当政治问题。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比较多,这些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还希望抢购走一部分。所以,这次全面放开粮价,比过去玉米面提一分钱还简单。事先没有保密,也没人去抢购。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价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按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计算,95%已经放开,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90%已经放开,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85%已经放开。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价格也接近20%,可以说,中国的价格已经放得差不多了,可以说已经实现自由定价了。

这时,不少人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

## 一山放过一山拦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价格放开到这么大的程度,但价格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价格能否正常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作用,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看价格是否由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能否反映供求关系。从1993年的情况来看,价格虽然放开了,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例如:

国家虽然放开了价格,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并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国营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宁可烂在仓库里,也不降价卖。有些国营企业的采购员,并不是择优选购,而是按回扣多少选购——国营企业对价格并不敏感。有些商品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现象。价格放开以后,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这些情况说明了,计划价格虽然废除了,但是市场定价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放,还要立。要建立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价格的法律体系。价格放开不等于价格自流,要用种种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如“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对价格很敏感的企业,这就要在产权改革上下功夫,等等。

作为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价格是指广义价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价格。所以,价格改革还应当包括后两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地租),外汇的价格(即汇率),技术的价格(即技术转让费)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率。从理论上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应当由市场来形成和调节。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革,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因为这些是其它各个领域改革的结果。没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

有市场利率。没有外汇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自由汇率;没有完善的技术市场,就没有合理的技术价格。

由于缺乏产权价格形成机制,在国有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一些对企业有控制权的人低价收购国有资产,有的甚至自买自卖,变相瓜分国有企业。

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源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经济发展讲,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就是资源的短缺。由于资源没有市场化,中国的资源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状态,价格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一些掌握资源的特权者大发其财,资源浪费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改革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炎黄世界》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立足广东,面向海外,纪实为主,刻画人物,贴近群众,干预生活,关心社会,注重民生,编辑力强,新闻性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写出内涵,体现亲情,突显风怀,溢露馨香,一流内容,一流包装,大型开本,彩色印刷,售价低廉,仅6.5元,单月出版,全年39元。

本刊由《家庭》原总编辑李骏主持编辑业务。

刊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Q)1126

邮发代号:46-159,欢迎到国内各地邮局订阅。

社址:广州市永福路42号永福楼西塔五层504室

电话:(020)85171214、85171024



#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

林蕴晖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们感到震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煽动的结果，还是社会主义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思索的焦点。

## (一)

关于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大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题注是：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中对匈牙利事件写了以下一段话：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页。）

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1956年12月10日的新华社新闻稿刊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通过的决议（摘要）》原文是：

《人民自由报》12月8日刊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在12月2日到5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23人，会议讨论了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卡达尔在会上作了报告。有21位同志在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和辩论的过程中发言。

决议说，10月23日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过去的领导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方法，单纯行政命令的手段。决议说，这种有害的方法不论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不论在国家的生活，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些方法阻碍了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中扩大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方法强加给人民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阻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决议继续说,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能够承认和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它在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实质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重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指示。

由于严重的错误而激怒了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民主群众进行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但是他们仍是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

群众性民主运动中忠于社会主义的参加者们,在十月事件之前、在事件发生的时期和事件之后都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接着,《决议(摘要)》讲了二、三、四个原因是:

会议在分析第二个原因的时候指出: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中,以伊姆雷·纳吉和格佐·洛齐松为首的集团对于10月23日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在策划和发动十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

决议说,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163—164页。)

可见,匈党临时中央分析了四个原因,放在第一位的是原来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

与上述决议内容相一致的有卡达尔在1956年11月22日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会谈记录。卡达尔说:

我们把10月23日的行动称做武装起事,这是因为参加这次起事的除了正直的人以外,还有其他分子。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称为反革命,因为这次行动的参加者大多数并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

关于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

首要的原因是政府领导人犯的 error。这条由拉科西制定的党和国家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

在许多 error 中间我想强调两点:

1. 严重伤害人们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恶劣的

后果。人民群众行动的主要动力是由于民族感情被伤害,而这又被利用来掀起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

2. 社会紧缩。1949—1953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一部分原地不动,大部分倒退,而同时军队和军费开支相对大了些。

……重要的原因还是破坏法制,滥用职权和冤假错案。

下面我谈谈国家保安制度问题,这方面有两个严重的 error:

其一是国家保安局被非法用做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反对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其二是人民群众厌恶国家保安局,因为国家保安局把自己大量的人员用来反对劳动大众。

匈牙利共和国一共只有900万人口,而其中近100万人被认为是怀疑对象,这100万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都受到监视。实际上,整个国家也只有4万—6万霍尔蒂分子,他们才应当受监视。

上述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信任感。他们厌恶这个保安制度……

这就是许多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爆发动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对上述 error 不正确的批评。而在不正确的批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纳吉集团。

……

第三个原因是旧的反革命。(注:澜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0页。经过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11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匈牙利问题专家澜思静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



刘少奇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的新的提法是：“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这包含有对当年纳吉的某些政治主张的肯定。”<sup>①</sup> 阙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268—269页。）

以上可见，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月23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党临时中央全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是因为对整个事件起因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 (二)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

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做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发生事件的原因，波兰、匈牙利都是由苏联解放的，不是自己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斗争中，党没有用群众路线，组织起工人农民阶级，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学生欢迎西方，不喜欢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把好人卡达尔、哥穆尔卡等人整了，真正反革命没有肃清；对资产阶级采取没收的办法，树立了敌人，土地送给农民，工农觉悟很低，没有阶级觉悟，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把阶级关系湮没了。以上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重工业投资过多，没有重视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所以走上马路。

第三，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教条主义不灵，因而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波兰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设顾问，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尊严，反动分子则以此煽动反苏，支持苏联的群众就挨打，这同这些国家党员的民族主义有关。

第四，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错误，在这些国家党员中引起民族情绪。斯大林垮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跟着垮。二十大以后，控制不住了，煽起一个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

第五，波匈事件发生初期苏共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跟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差不多。格罗骂群众是法西斯。

第六，还有一个南斯拉夫煽动。



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注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要点,1956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三个远因是指从1945年东欧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发动群众,从1948年前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到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犯有严重错误:以肃反名义镇压党内的反对派;照搬苏联经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大国主义,伤害了人民的民族尊严。三个近因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错误,引发了东欧各国人民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激化了人民反对本国领导人错误的情绪;匈牙利领导人格罗诬蔑群众的示威行动是法西斯,激化了矛盾;南斯拉夫的煽动。因此,在谈到应吸取的教训时,刘少奇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进行总结,而是着重从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尤其是从制度层面谈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以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为此,刘少奇提出了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群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都要认真研究。当然,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党的纪律。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就算做违反纪律,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做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

其二,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

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

第三,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再就是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

最后,刘少奇说,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做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除了防止领导机关、领导人员脱离群众,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外,鉴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导致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人民不满的教训,刘少奇还对如何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说: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发展的比例是否恰当?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

同志也讲,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一点,“左”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4页。)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除了领导人的生活不要与群众过分悬殊,取消特供等特殊待遇和过分的警卫制度,绝不能对人民群众动用专政的手段,以及经济建设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对领导人的权力要有制度的约束。可以认为,这些是当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 (三)

对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不是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吸取教训,而侧重从加强制度建设,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改变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建设方针,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进行思考,这在刘少奇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是他从年初对中央各部委的调查研究,到中共八大的报告,系统思考的直接继续。

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农业合作化热潮带动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热潮,打断了社会经济的原有链条,产供销之间出现脱节,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损害,市场上开始出现商品品种短缺、质量下降等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改组带来的新问题,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中也露出了某种不满的苗头;自思想改造以来的不断政治运动,尤其是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引发的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精神上受到伤害,处于备受压抑的状态。因此,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严重错误、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罢工示威游行之后,中国国内也出现某些不安定情况,主要是农民闹退社,城市手工业者出现退社单干潮,以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情形。

针对年初出现的情况,刘少奇在对中央各部调查听取汇报时,就曾着重谈了经济建设怎样才

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要求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把外国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调动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要从劳动制度上进行改革,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思想文化领域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要着眼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等。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更从制度层面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其中重要一条,是提出要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了同官僚主义做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乃至由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建立和健全法制。他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并提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了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刘少奇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能更好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力求避免犯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253页。)

可见,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如何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出的种种举措,正是他把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刘少奇当年提出的应当重视和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要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制度的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对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 杨尚昆 1986 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 ◆ ● 张培森 整理 ◆◆◆◆◆◆◆◆◆◆

---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 40 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 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 100 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 1986 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 1986 年 8 月 30 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 20 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

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



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场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

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

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

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



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

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说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

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将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



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

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不能算。为什

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不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

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內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八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

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



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

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哩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2月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 丁龙嘉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 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

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的数字。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革”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1977年,有2.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收入74.67元;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公斤;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无有不受到严厉惩处的。

人民公社“左”的体制的冰封,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的。这个突破过程,实际上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二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实行包产到组。三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一是在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0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



1978年,万里(前左)在安徽农村调查时与农民一起劳动

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

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又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如《农村六条》这样文件的颁发,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

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为了保障秋播秋种,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借地渡荒”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一”,既不利于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生产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易导致利用职权、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妨碍生产的发展。并针对弊端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

离。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五是在肯定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万里在这些会议上专门阐述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道理。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六是在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0月,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1980年1月9日,万里在接见农业经济管理学学者杨勋时说:“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播到全中国、统一全中国。”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1980年2月万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支持下,排除怀疑和非



议,历经艰难和曲折,把包产、包干到户推向了全国。1982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自此,包产、包干到户在党的文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民边干边选择,干部边看边后退,到1983年时,包产、包干到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95%。这时,理论、学术界经过反复调查、讨论、研究,将包产、包干到户概括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历史的进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过程。尽管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生活是一步步否定了人民公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农村设立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全国有6.1766万个乡镇人民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92.6439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长达27年的人民公社完全退出了中国农村社会舞台。1992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议修改宪法中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现行宪法还有‘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当删去。”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公布实施。从这时起,包产、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法律地位。万里把人民公社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还主持了从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人们评价说,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

1978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30477万吨。到1984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40731万吨,人均占有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 倡导、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改革,主张走市场经济之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但如果只从这一方面来评价其意义,那是远远不够的。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改革初期,一般只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忌讳讲商品经济。有的人因提商品经济而挨过批,更何谈市场经济呢?!尽管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80年5月肯定包产到户的同时肯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并在后来又多次提出要搞商品、市场经济,但在一段时间内,全党并没有取得共识。

万里曾指出,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万里从最初安徽的农村改革中敏锐地觉察到,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将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农民通过承包,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可以不由上级而由自己决定;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可以不由集体而由自己支配;专长之发挥,身份之改变,经营项目之选择,可以不受限制而由自己决定。这就为劳动力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为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正因如此,万里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80年7月,万里在总结过去30年农业的经验教训时,讲到“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阶段,缺乏现代化经济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指出“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81年10月,他在准备第一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商品经

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1982年11月，他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万里强调，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万里不但力主，而且竭力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前半期，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迅速地发展起来。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被当成了精神污染而受到批判。但由于改革开放实践中特别是农村改革实践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理论界的努力，特别是由于邓小平包括万里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终于在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称“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可能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万里具体指导农村改革的思想和农村改革中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为1984年中央确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奠定了一个方面的基础。

实行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即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个制度，起因于1953年国家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造成粮食等供不应求。历史地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又保证了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外汇来

源，但负面作用也十分显著。一是长期抑制了中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割断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主体的联系，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使广大农民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劳动自由权之外，又失去了对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造成了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农村经济长期落后。在统派购农产品的数量方面，农民与政府没有对等谈判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的征购是带有强制性的，征购的数量超过剩余的数量，当时称购“过头粮”，也就是把农民碗中的饭强制挖走了。在1958至1983年人民公社的25年间，年均国家征购的粮食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3.37%，这个比例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期间，国家对棉花、植物油的强制性征购占实际产量的比例令人震惊，1958至1976年的统计显示达到年均90.67%。而且，国家征购粮食等的定价是带剥夺性的，国家牌价比私下交易市场价低得多。长期的强制性的政府超额征购，长期的剥夺性的政府定价，能不造成长期的农民贫困和农村经济落后吗？！实践表明，在农产品供应丰富的时候，不宜采取统购统销这种制度。

1984年，长期粮食紧缺的局面全面缓解和中央决定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在万里的主持下，198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实行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5年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此邓小平称在改革方面“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这个决定及其实行，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三十多年形成的惯性，使这项制度的改革只进行了一部分，即取消统派购，保留统销，使粮食的购销价格长期实行“双轨制”。“双轨制”，造成了收购体制与销售体制脱节，造成了价格体系的极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双轨”中的政府控制的那一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培植腐败和维护特权的温床（两种不同的价格形成的差价极大地诱发了腐败），部分既得利益的特权者又本能地维护政府控制的那一轨而抵制市场调节的那一轨。万里对此于1986年12月就指出，“那个定购合同是单方面的，只让农民保

证,政府什么保证也没有”;“现在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要继续改革”;“‘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统购统销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终于被市场所取代,退出了社会舞台。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的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使中国向市场经济前进了一大步。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万里早在1985年1月就指出要搞市场经济。他说:“如果城市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搞,它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那么,农村的优势在哪里呢?也要搞市场经济。”在万里那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被当作同义语或者当作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来理解的。万里是一直提倡搞市场经济的,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声浪很高时,他依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在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万里立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说:“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万里本人主张采用这样的提法: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或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后来发生的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证明万里主张采用的提法是很有道理的。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万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1993年修改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万里强调指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



1978年,万里(前右二)下乡检查工作

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 搞得慢,振兴就慢 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开拓者之一。

### 热情支持农民自办、联办企业,积极主张采取正确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参与开辟了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之路

萌发于1958年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在1958至1978年的20年间,由于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束缚,一直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私有财产迅速增加,从而为农民选择投资方向、改变原来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条件。自然,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成为农民致富的选择,部分农民自办或集资办起了企业。但是,部分人只把原来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把农民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准农民办的企业享受乡镇企业的政策优惠,甚至加以歧视。万里了解情况后,热情支持农民创办企业,指示把农民创办的企业纳入乡镇企业的范围内,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于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要一视同仁。





1986年,万里(前右三)在安徽芜湖视察工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市场短缺,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有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甚至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归咎于乡镇企业,致使乡镇企业处境相当艰难。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指出社队企业的重要性,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撑了腰。这年3月,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积极引导”。

万里提出的两个“一视同仁”,即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一视同仁,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将乡镇企业的发展送进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万里在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又专门讲了乡镇企业问题。他严肃地要求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不允许平调企业的资金和物资。他指出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他说,向乡镇企业征税,无非三种办法,上策是“欲取先予”,中策是“又取又予”,下策是“只取不予”。他要求坚持实行上策或中策,避免采取下

策。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于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再次阐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和政策原则。

从1985至1988年的四年间,乡镇企业实现了职工人数、利税总额、工资总数、总产值的同步高速增长:职工人数年均增长16.4%,利税总额年均增长32.6%,工资总额年均增长37.3%,总产值年均增长39.6%。乡镇企业创造的非

农产值,到1986年就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到1990年在农业总产值中上升到54.6%。乡镇企业在最辉煌的时候,为国家创造了将近一半的产值,上缴的利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5以上,吸收了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对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于1987年6月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因此,他称之为“异军突起”。国内外许多人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并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项伟大创举。

万里则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他说:“乡镇企业没有国家投资,是农民自己集资和贷款搞起来的,因而也就没有国家计划的限制,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开始就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它的困难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在这里。乡镇企业尽管存在着重复建设,污染环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它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最大的功绩是吸收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市场的发育,又大大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长,大大促进了横向联合的发展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超越地域与部门的局限,以更大的规模向前推进。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

了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小城镇的勃兴,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缩小了城乡差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接替万里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的田纪云,持与万里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改革之前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城市工业化道路”,“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笔者认为,农村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万里、田纪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和未来的农村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着眼点不仅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更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探索者之一。

笔者在回顾、研究万里在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时,常常会为他的惊人的勇气、巨大的魄力、卓越的见识,实践的观点、求真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而赞叹。万里为什么能够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达到如此的境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的公仆,他的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他的理念、言语、行动代表着人民

群众的利益。当他面对着啼饥叫寒的群众时,眼中淌出的是热泪,嘴中说的是“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呀”!“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为什么变成了普遍贫穷的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他面对着教条主义者质疑包产到户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时,反问这位坚持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教条主义者声称他要社会主义,万里则旗帜鲜明地说,“我要群众”。不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当他面对着包产、包干到户姓“资”不姓“社”的攻击时,诙谐地反驳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万里自己说得好:“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改革,特别是切实地、稳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政高级干部,都应该以万里为楷模!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喜讯:几千元出版个人文集!

### 出版说明: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都有出版个人或家族文集的习惯,但现在出版社内容审查严格且价格昂贵,谁能帮助广大民间作者低价快速出书呢?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专门设立《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为个人少量出书提供专业服务,三年来已为四百余位作者编辑出版了精美的个人文集与书刊画册,深受国内外著作者的喜爱和好评。欢迎各位作者朋友来电咨询或来编辑部做客!

### 出书范围:

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回忆录自传等纪实作品、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思想学术论著、旧书翻印等。

### 服务流程:

作者提出出书意向→公司计算成本价格→上门签约支付定金→协助整理完善稿件→电脑录入编排校对→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作者二审→设计封面插页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印刷出版送书。

联系电话:010-68920114

010-68920182

投稿邮箱:grcsw@126.com

涂主编:13693651386

13521186881

毛编辑:13901218759

冯编辑:13718619470

个人出书  
精神长存



详情请登陆《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内 邮编:100089

#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

• 方小宁

像许多参加新中国建立的革命者一样,吴健民抓过笔杆子也抓过枪杆子。他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潮州市委书记、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炼狱洗礼;“文革”后,他在珠海市委书记、珠海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

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 叶剑英 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师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陵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陵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



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方法例。叶帅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用广东的名义办全国的特区,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全世界都承认,否则以后杀头都不知怎么被杀的”,为办好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 邓小平 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初,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五年的实践,但怀疑、反对的意见仍然不少,舆论尤对广东不利。这年的1月26日,主持接待工作的吴健民到深圳迎接邓小平一行。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指定吴健民一人上了面包车,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珠海市人民政府挂牌仪式(右前一为吴健民)

一路上,吴健民向小平同志汇报特区创办过程、目前的发展与面临的困难。当汽车开到拱北关闸口,小平同志看到澳门那边楼房破旧萧条,拱北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整洁的关闸广场,顿时兴奋起来,脸上堆满笑容。汽车转上迎宾大道,40米宽的新马路实在舒畅,老人朗声说:“你们做得对!”

车到九洲港,小平同志下车巡看这个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仅年余时间建成的现代化港口,老人开怀欢笑。接着,又看了直升机机场和工业区,进到毛纺厂、电子厂参观。汽车行进中,老人不时纵目看珠海的城市建设、园林布局,时轻时重地点头说“好”。在老人身边介绍情况的吴健民,体会到小平同志是要全面检验特区发展的质量,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午餐席间,吴健民布置宾馆经理请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把目光转向吴健民,带笑问:“你看写什么?”说着,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字。全场掌声热烈。吴健民问老人:“喝点茅台?”小平答:“可以!”

吴健民说:“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很多,费多大劲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检视完深圳、珠海的建设成就之后,豁然开朗,才由衷写下这富于远见的七个字。他到南方视察,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思路,他的嘉

许和鞭策,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在一线拼搏的开拓者如释重负,顶住压力奋勇前进。”

对于吴健民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心血,他们的胆魄和风范,是他难以忘怀,学之不尽的。

## 要科学地放开自己的手脚

1978年,吴健民受命到珠海之时,那里还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座工厂,一家饭店,马路上人车鸡牛混合走”的小地方。

基于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吴健民了解到珠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外开放传统,这里曾孕育了容闳、苏曼殊、唐绍仪、容国团等等风云人物。珠海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海岛过百、海岸线长、资源丰富。这里地属亚热带,很多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生长繁茂……是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一张可以好好地构思、画出美丽画卷的白纸,绝不能野蛮开发。

遵循科学实践观的原则,吴健民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首先组建各机构的领导核心。当时全国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吴健民冒着政治风险,大力引进各方人才。原市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珠海市委灯火通明的三个办公室是书记室、机要室和组织部。第二件大事是确立建市方针,制定总体规划。除了组成以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为主要力量的珠海规划室外,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论证,反复考量后,定下把珠海“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市”的总方向。诸如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工业建设、农林牧渔等方面,都审慎地做出了规划。

拓荒难,改变落后观念更难,要排除极左思想干扰尤其难。当时,本地和外来人员偷渡到澳门,一律都按政治问题处理。吴健民意识到:只要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偷渡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报省委批准立即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农民所生产的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运往澳门、香港销售。以珠海湾仔的农户为例,在恢复小额贸易后的8个月内,仅鲜花一项,就收入52.3万港元,从中拿出部分买酒糟回家养猪。当年,澳门每年有两万桶酒糟出售,25斤一桶卖4毛钱。2.5公斤大虾在澳门可换得180

公斤柴油……政策对头,激活了经济。珠海的面貌出现了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成批地回来了。边境不稳定问题获得解决,珠海与澳门的合作进入良性循环新阶段。

当时,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到七十年代末,成山的垃圾已超过80万吨,时刻喷放恶臭、孳生疫病、毒害土壤、附近海域鱼虾绝迹,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生命安全。吴健民看了格外痛心!但当时珠海有部门却把这视为生财之道,每天派船运回垃圾做些买卖,年收入约100万。为这事,珠海市委层层商议、民主讨论,才扭转了死抱“小饭碗”的抵触,结束了澳门垃圾污染的历史。

当年,市委还决定不搞政治城徽,而是结合风土人情,建一座美丽的“珠海渔女”石雕。有些干部听说这要花20万元,极力反对。1984年,北京举办“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珠海渔女”被放在首位,《人民日报》还作了报道。至今游客络绎不绝地留影,雄辩说明了艺术的魅力和市委决策的正确。

其他“主干道是40米宽还是20米宽”、“建滨海城市阻碍了‘三来一补’”、“错过了原始积累”等争论,都越辩越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吴健民把这称为“渔村的艰难起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开拓者,吴健民深有感触。他回忆道:当年胡耀邦提出,“看准了的东西就主动去干。具体地说,中央没有想到的可以想,中央没有限制的可以干,中央规定得不对的可以争。”党中央这种开放的态度,创造了特区建设生动活泼,大见成效的局面。他认为:今天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2007年,科技发达、商贸活跃、环境优美的珠海被选为“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每天早晨或黄昏,人们在当年建设的情侣路漫步,享受着花园城市的清新空气……吴健民欣慰地说:“我是属鸡的,但却是牛的命,经常当开荒牛。当然,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拖着耕具倒下,埋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个心安理得的归宿。这也是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 普世价值： 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 彭迪 钱行

普世价值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划清一些影响国家甚至人类前途的是非和善恶问题的界线。但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是不是西方的专利品，它有什么利弊，下面再谈。但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

回头想想新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中国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重要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以缺乏人性的专政压制民主，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宣布普世价值观是反动思想，禁止在中国通行。这种闭关锁国一意孤行的偏见到文革时达到顶峰，使国家的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给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再抬头看看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战开始，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推翻了维护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的专制独裁。紧接着以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大得人心。随后又按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果断地实行了给人民以广泛的发展经济

的自由空间，释放了人民的巨大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胡锦涛强调的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请问：各国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同我国广大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而要对它大张旗鼓加以讨伐？当世界各国热爱普世价值观的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中国某些权贵人士的反对噪音又会如何想呢？这种从原则上诋毁普世价值观的主张只能说是对内煽风点火，对外挑拨离间，违反科学、脱离群众、到处树敌，孤立自己。

有人企图搬出阶级斗争观点来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普世价值观，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只有互相斗争的阶级观，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不管是根据什么主义或理论，是对人性的歪曲和丑化，似乎人类只有阶级对抗你死我活的兽性而没有远远超越其他动物的人性。人类不但有高超的智力，能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有高尚的人格，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能反思，有感情，有是非善恶优劣的意识和真善美的敏感。人类在有了阶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阶段中，阶级压迫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悲剧，至今历历在目。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人类会在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理国施政的方式方法，催生一个以人为本的正常社会。在这里，人们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合力，协同解决社会里各种不同的问题，使一个和谐社会诞生，健康成长。

总之，从野蛮到文明社会，人类走过一个痛



苦的过程。阶级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殖民掠夺,帝国霸道,冷战对峙,导致不断的革命与战争,给世界难以估量的灾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高峰。人们痛定思痛,想寻找调节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出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践中,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发展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化解矛盾、平等相处、自由生活、民主管理、仁爱宽容等本性和品德。对人类社会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它在欧洲人反对封建、宗教和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它的价值远超出欧洲。这种价值观是人类在探索过程中达到的比较公平,顾全大局,兼容并蓄,可以说是最大限度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君子协定。它不是完美的,更不是排外的,但的确被许多国家广泛认同。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反对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 页)

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各国如果同意这些原则,可以各自制定维护这些原则的具体制度和安排。事实上,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创新。欧美国家大都通过立宪来落实这些原则。有君主立宪,有成文宪法,有不成文宪法,有总统制,有内阁制,日本还保留了天皇制,等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听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字眼就反感强烈,硬说这些价值观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而深恶痛绝,甚至断言这些普世价值观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我们共产党置于何地,似乎共产党反对和害怕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原则,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反“精神污染”和大骂人性论的日子。这种言论和中国普通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恐惧,或者因为普世价值观这个词来自西方,有人不喜欢,那么,改一改,比如说,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观,脊梁价值观或者世界公民价值观,等等,可不可以呢?随着人们的认识、悟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普世价值观的内涵还要继续发展,人类的人格也会更加丰满高尚,形成一个人类自觉克服缺点,自我超

越,自我完善的美化过程,就像一曲交响乐,一直演奏下去,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2008 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既震撼世界,也发人深思,联系起来看,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历史的分水岭。上半年在中国发生的四川地震,下半年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两件特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其他重要事态的新发展,对当前这个充满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人们又在询问、反思和探索:世界要往哪里去?有没有共同利益和语言可以互相交谈,交流直到交心,增加理解,缩小矛盾,争取共存共赢?

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小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它从美国开始,但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是欧美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垮台,尤其不能自由联想,说它是普世价值观的破产。在工业革命的启动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 300 年的历史。在发展危机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它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修补,并且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早已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又到了一个大调整、修补和更新的时候了。当前的危机看来主要是那些操纵大公司银行财团企业的看不见的手,为了追求暴利,不顾后果,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规律而不能自拔,加上美国人一向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一旦公司企业信用破产,使广大的人民蒙受重大的损失,顿时消费市场凋零,从房地产开始,经济一蹶不振。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对市场特别是对大公司银行企业加强监督调控干预,亡羊补牢,紧急救援,效果如何,人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有些排外论者还想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嫁祸于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从政治角度分析,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正是因为金融操作中偏离了公正廉洁的道德规范和民主透明的监控机制。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危机,正需要提倡而不是嫁祸于普世价值观。

中国同样也在经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不可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更不应西方国家有任何幸灾乐祸之心,高唱反调,而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首先稳住中国的

经济形势,同时加强同外国的协作,争取共渡难关。有人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完全是外国引起的,看不到中国自身的脆弱。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首先,200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经济实力发展的成绩与速度十分突出,举世瞩目,但也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贵勾结,贪污腐化的现象水涨船高,屡禁不止。各色假冒伪劣,伤天害理之丑恶,层出不穷。这些负面现象暴露了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软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出口带动经济作为措施之一是必要的,但过分依赖出口不是可靠的长远之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急剧减少,我国决定重点转为大力发展内需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转变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国家积累的税收财富之多,占有的国土资源和生产资料之广,行政权力之大,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之落后,加上钱权结合,贪污腐化之严重,使国家的财力畸形发展,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已非一日,突然要加强内需,提高国民特别是广大基层人民的购买力,也不是一日之功。由此可见,配合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在这个关键时刻,从政治上参考普世价值观的原则应该是有益的。

2008年并不都是负面事态。中国主办和世界支持的北京奥运会就办得很出色。它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新契机,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起着催生和启发的效应。人们在问,既然有同一个梦想,难道就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可以分享?

另一件好事是,伯仲对峙近60年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转机。先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以国家利益为重,高瞻远瞩,摒弃前嫌,恢复了党际关系,两党高层领导经常直接对话。特别是去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坚持分裂中国的势力在台湾选举中失败,国民党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空中海上通航和邮政关系恢复),为两岸关系全面恢复,铺平道路。虽然两岸统一问题还不成熟,但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加上双方的善意给和平解决分歧开拓了很大空间。岁末年终,大陆的团团圆圆乔迁台湾。两岸双方的深情迎送,感人肺腑,生动地反映了同胞骨肉之

情是牢不可破的。胡锦涛在新年前夕发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呼吁,高屋建瓴,为力争民族和解,国家统一,既尊重历史,又敢于历史创新,表现了极大勇气、诚信和宽容,深得人心。如果双方再在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上能取得共识,将从根本上缩小分歧,则和平统一有望,两岸同胞将额手称庆。

从时机来说,也许是凑巧,又是在2008年,美国大选创造了历史,第一个社会底层出生的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其实,这也并非偶然。这次选举参加投票人之多,对候选人的调查研究、争论比较之认真,基层普通平民给候选人捐献之踊跃,在美国历次竞选运动中是少见的。尽管种族歧视在美国并未肃清,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远非完善,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在国内外都不得人心,但这一次,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奥巴马当选,都表示赞许。这不仅是对奥巴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黑人的祝贺,也不是预期美国政局当即会有多大改善,而是为美国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努力过程,为实现美国人珍视的民族平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取得的新成就而感到鼓舞。

这件事情,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也引起热烈反响。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一位中学老师发表感想说:奥巴马当选(总统)“激起了人们对真正自由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的向往”,而广大农民在中国还受到“二等国民”的歧视,连办个户口都困难重重。他认为对普世价值观的排斥是“某些人单方面设定不容置辩的‘国情特色’作为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

另外一位没有署名的作者在“农民学习动态”上发表感想说:普世价值观难道不是各族人民实现幸福生活、发展与完善个性、获得人格尊严的基础吗?试问有哪个民族愿意被人奴役、愿意被人强行“代表”、自甘堕落、不要人权、不要尊严、不要公平、不要自由呢?

资深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公平等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维护普世价值观的呼唤,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阶层的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社会生活公正和谐,国家事务人民做主等等共同的期望和理念不是哪几个人孤立发明的,没有谁可以垄断、剥夺或否定。因此,把这些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将继续发展深化。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出有益于人类的公德交流促进,给普世价值观增砖添瓦。中国文明中也不乏公认的道德理念。中国孔孟老庄的哲学伦理和道德观念,如忠恕仁爱信义和平,以人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国家也被奉为至理名言。在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遍布全国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学者对中国哲学伦理研究之认真和有关出版物之多样,反映了他们思想开阔,令人钦佩。他们并不因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中国而加以排斥蔑视。

人贵有自知之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后起之秀。独立之后,它继承和发展了西欧特别是法国革命的传统,创立了一个民主和开放的新国家,吸引了全世界向往政治民主、个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发达的人连绵不断地涌进新大陆,其中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宽容的政治环境中,以他(她)们的劳动和才华,建立了第一流的现代文明国家。美国的成长经过痛苦的也包括流血的改革过程。它现在的制度也远非完善,运行中更是问题重重,但他们的开拓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精神遗产带有普遍意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跃而成为头号超级大国。不幸它缺乏自知之明,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受到世界的反对和谴责,声名扫地。但它对内奉行的民主和开放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

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中国先人早期创造的文化思想中也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遗产。除了修身治家的道德准则外,也有治国安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萌芽。例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王者以民为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不可凌驾于人民之上),等等。但由于历史条件,难以得到合理的继承和积极充分的新发展。

我们这个古老的,曾经强盛过的泱泱大国,一旦不求自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后,贪腐弊端日积月累,由强转弱,由盛转衰。与此同时,率先工业化的列强势力扩张。晚清时代,中国曾经企图单靠进口西方国家的科技成果,坚船利炮而不同时借鉴西方的民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抵御列强,结果以弱国逞虚强,屡战屡败,吃了大亏,几代不得翻身,经历着深深的伤痛和耻辱。帝制时期,普天之下,都属皇帝臣民,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谈不到什么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幸夭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昙花一现。暴风雨式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席卷全国,连“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先驱者们倡导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都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草而扫地出门。这一系列失误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创伤,罄竹难书。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反对总结教训,压制言论自由,甚至迫害不同政见者。其实,问题就出在恐惧和抵制绝大多数国家珍视的以民为本的普世价值观,把它斥之为来自西方的诡计阴谋,洪水猛兽,为中国所不容。。

过分强调所谓中国特色,单凭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是建不成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事实证明,包括亚非拉美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依据崇高的普世价值观,以不同的形式,从专制国家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些普世价值观是中国优良传统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千万不要由于这些中外的普世价值观的实现可能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而横加阻挠。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老百姓不希望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摆脱专制统治。只是在有些国家,人民连话语权都被少数人垄断,不敢直说而已。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中央肯定这些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向世界公开宣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



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宪章基本人权原则”等文件上都早已签字。中国大使李保东 2007 年 11 月在联合国会上说：“和平、自由、平等、公正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中国人民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不应该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胡锦涛在 2008 年 12 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0 周年之际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人为本，同各国人民一道，切实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二十世纪从血腥的热战到严酷的冷战，给世界造成的苦难应该使人类变得更加清醒和明智。如上所述，21 世纪伊始就发生了一系列人祸天灾，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大举入侵小国的单边军事行动，百年不遇的地震海啸和席卷全球的财政经济危机，再加上核武器的扩散，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

生存和安危。这一切都表明，说地球是平的或圆的，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确实好似一叶扁舟，在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大洋中飘荡。谁都不能夸口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能够压制他人，领导世界，平安导航到达理想的彼岸。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消灭，但普世价值观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应该是大家的行为准则，定能有助于缩小分歧，促进世界大同。

站在历史的拐点，我们中国有东方大国的宽容气度，更应该发挥主动性，大力求同，缩小差异，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立异，更不要节外生枝，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制造莫须有的障碍。在本国策中，我们需要的是思想上充分肯定普世价值观的意义，行动上加强它的落实力度，扩大它的内容，包括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以及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同舟共济，互相支援，虚心学习，取长补短，群策群力，才能战胜特大的天灾人祸，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完成马克思发出的解放全人类的号召。

(责任编辑 萧 徐)

##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

• 周瑞金

在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后，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迎来的 2009 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当是喜忧参半，乐观与忧患并存。

跨进新的一年，作为一个一辈子吃媒体饭的老报人，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从忧患中看到的乐观景象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喜看“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截至 2008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2.53 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

与延续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呼应，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虽然滞后，却也准备了底气深厚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份额过半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一般认为，在 GDP 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约 40% 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量的贡献超过 60%。另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调查结果，早在 1998 年，中国私营企业在整体经济和所有企业中的增值份额就已超过了 5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早已是以私营经济而非公有经济为主体。如此规模的非公有经济，是“文革”专制暴力不会卷土重来、改革不会夭折的坚实的经济保障。

非公有经济中，生长出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引用权威人士的统计说，“新社会阶层”目前大约有 5000 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 1.5 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 10 万亿元左右

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 1 / 3 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社会阶层”如何走出体制边缘甚至是法律边缘生存的状态，如何摆脱官商勾兑的“原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框架内健康发展，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要求和获取社会政治空间，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关系到政权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新社会阶层”之外，需要极大关注的，就是这 2.53 亿网民。在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群体中，据 CNNIC 最新调查，有 81.5%、约 2.06 亿人使用网络新闻，有 38.8%、约 9822 万人访问网络社区中的论坛 / BBS，有 42.3%、约 1.07 亿人拥有博客 / 个人空间，其中 7000 万人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 / 个人空间。我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社会不公，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从民间反日风潮、奥运火炬传递到汶川大地震、瓮安群体性事件，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溅、呼风唤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行动，影响社会。

“新意见阶层”的出现，值得关注，值得欣慰，值得研究。

## BBS 是民主政治里程碑

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是 1994 年 4 月 20 日。开始时，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慢慢成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真正成为一种言论工具是在 1999

年。

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3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当时我分管《人民日报》国际报道和网络版,5月9日凌晨获悉消息后,立即向报社和中央领导汇报。记得当时是群情激愤。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暴行。《人民日报》编委会郑重研究了事件的报道,安排《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人民日报社的子报《环球时报》编发了号外。我和网络版负责人商量,这一天是个时机,又有合适主题,可以开通BBS论坛,让广大网民就这一事件自由发表看法。从政府到民间,对弘扬爱国主义、谴责国际强权政治有高度共识,这时候开通论坛不会出现宣传主管部门担心的言论失控情况,却能以此为契机为互联网打开一扇言论开放的窗口。

5月9日晚上,“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上线。不出我们所料,网上反应非常热烈,每天帖子上万条。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言论,但欣慰的是,舆论的多元化反映出来了,内容多样性出来了。论坛后来改名为“强国论坛”,如今注册账户77万多,聚集了一大批关心中国时政的中文网民,被海内外誉为“天下第一坛”。2008年5月9日晚上,“强国论坛”开通9周年,我应邀登录论坛,发帖说:“拜托新坛主们不负众望,把强国论坛办成民主论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实现民主化之日,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时。”

以“5·8事件”为催生婆,以爱国主义为旗帜,BBS在国内获得了合法性。“强国论坛”之后,一些政府网站纷纷开设BBS,像湖南“红网”的“红辣椒论坛”在当地也较有影响力。一些市场化的论坛/BBS,如天涯社区、一塌糊涂、猫扑,对特定人群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在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日趋峻切、下情上达功能基本丧失的背景下,被遮蔽和压抑的民意从此找到了一个发表、发泄的便捷渠道。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1999年前后浮出水面的其他2种民意表达载体——“即时通讯”(Instant Messenger)和手机短信。1999年2月腾讯公司推出QQ的第一个版本,“即时通讯”在年轻的网民中迅速流行开来。1998年中国开通手机短

信业务,2000年11月中国移动“移动梦网”短信平台开通,手机短信走向繁荣。这2种意见载体主要属于一对一的沟通,影响力次于论坛/BBS,但QQ群也是不可小看的分众网络群体。

## 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论坛/BBS具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普通民众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意见,并及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

以1999年为发端,2003年成为网络舆论的第一个高峰。这一年,一南一北两起平民百姓罹难的悲惨遭遇,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4月在广州街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强行收容,很快惨死在收容所。10月在哈尔滨街头,富家太太苏秀文与菜农发生争执,富家太太发动宝马车冲向现场人群,“就像收割机在麦地里割倒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菜农妻子刘忠霞当场被撞死,撞伤12人。两起事件未得到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正处理,导致互联网上民怨沸腾。网络舆情惊动中央政府。在温家宝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废止了一部施行多年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纪委过问复查宝马撞人案,并在事后悄悄惩治了与宝马案相关的检察院、法院官员和省政协主席韩桂芝。

2007年是网络舆论的第二个高峰。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市一位房屋产权人拒绝拆迁,在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后,仍然坚守孤楼,还在楼顶升起了国旗,以表决心。此事发生在全国人大审议《物权法》前后,围绕这项公民最重要物权的得失,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展开了热烈的议论。民意和媒体的压力,导致当地政府、开发商放低身段与“钉子户”协商,最终达成妥协。

2007年6月5日,河南网友辛艳华以“中原老皮”的网名,在“大河网”上发帖:《400位父亲泣血呼救 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帖文被转载到影响更大的天涯社区,并被置顶。山西农村黑砖窑中现代“包身工”的惨剧,让全国人民震惊。4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一位政治局委员做出严厉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带头,中央多个部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赶赴山西洪洞县。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压力下,山西省在全省仓促发起一场“解救被拐骗农民工、打击黑砖窑行动”,省长出面向公众公开道歉。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并对善后工作提出要求。

2007年6月1日前夕,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短信,反对该市海沧区正在兴建的一个PX化工项目,号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议。厦门人聚集的QQ群上也传出类似的呼吁。6月1日和2日这两天,数千名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这是由新媒体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到12月底,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PX项目。市政府深明大义,倾听市民呼声,让市民参与到PX项目决策中来,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民间情绪。这也被专家视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2007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发现已经绝迹了二十年的野生华南虎,证据是镇坪农民周正龙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几十张虎照。随后,天涯社区的贴图专区里出现了一个帖子《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率先对虎照提出质疑,网易等网站和论坛跟进,批评陕西官场弄虚作假、丧失公信力,连《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打虎”行列。陕西省政府最初装聋作哑、死不认错,一直延宕到2008年大地震后,才由司法机关出面宣布周正龙作伪被逮捕,有关官员被惩戒,同时启动为期3个月的“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

## 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

2008年大事频发、波澜起伏,中国人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悲欣交集、大起大落。年初的南方雪灾,3月的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在境外受阻,“5·12”汶川大地震,互联网在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覆盖面、民众情感交流和意见表达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在这一系列牵动全国人民情感的大事件中,互联网无可争辩地成为信息传播和輿情汇集的主流媒体。

在南方雨雪灾害中,湖南、广东、贵州等省的一些城市停电、停水,铁路大动脉和公路国道交通堵塞,甚至道路断绝。传统媒体一时难以迅速全面反映灾情。在这个关节口,网络论坛/BBS发挥互动优势。很多灾区的普通人,特别是热心的志愿者们,用手机短信加网络传递最新灾情,把手机和DV拍摄的灾情图片、视频上传到BBS上,成为中国第一批“公民记者”。像活跃网友“北风”实地考察广州火车站后,在“天涯社区”发帖《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不是食品跟水》,短短几天内,点击量164516,回复1047。帖中说:“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是睡在地板上时的铺垫之物”。他同时提醒志愿者与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联系,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好心反而添乱。一些网络媒体也对网友的“公民记者”行动表示支持,凤凰网和天涯社区都表示愿意为到灾区现场直播的网友补贴费用。

2008年3月,在CNN等西方媒体发表了西藏问题的不实报道以后,一位叫做饶谨的年轻人迅速创办了一家域名为Anti—CNN的网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网站的日点击率达到500万,注册会员达10万人,全球网站排名维持在第1800名左右。正是因为国内网民在门户网站新闻跟帖、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的同仇敌忾,使西方媒体、政府和大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强大压力。

5月12日,一场8级大地震突然袭来。新华网等政府网站迅速发布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人民网和各大商业门户网站纷纷推出汶川地震专题,全面跟踪报道地震灾情和救灾进展。在汶川地震中,互联网把多种媒体信息整合平台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截止5月19日晚上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含图片、文字、音视频)123000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整合发布新闻133000条。上述8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这样的新闻发布数量和浏览量,都令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互联网信息的及时和丰富,而且是网络对民族情感的聚合作用。网民在新闻跟帖中,在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纷纷表达了对这场国难的震惊和悲恸,对遇难者和灾民的无限同情,对政府和救

援者、志愿者的崇高敬意。

地震第2天,5月13日一位叫做“绮梦”的网友以QQ聊天的方式,从都江堰坍塌小学现场发回文字“直播”《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位网友说,面对惨烈的受灾场面,温家宝查勘现场摔倒受伤和流泪。据说是总理在现场讲的这两句话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里的帖子《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截至5月15日,点击量达到698204,回复7457条。

也是在地震第2天,百度贴吧出现一首无名诗《孩子,抓住妈妈的手》,催人泪下: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

这首诗在网上复制流传,并在许多赈灾晚会上被朗诵。这首诗感动了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盛大网络宣布为灾区再捐600万元,捐款总额达到1000万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把1999年5月9日网络抗议美国轰炸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看作是网络媒体登上中国媒体舞台的标志,那么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则标志着网络媒体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评述说,汶川地震救灾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 走出政改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首要的政治逻辑,冲淡了“文革”后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政治觉悟,消磨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幸存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兴大革、再造江山的胆识和想象力。

由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从市场化的运作中获取暴利,并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下,排斥深层次的改革。

如何走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我们寄希望于领导层重拾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意驱动。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官场有志者受制于“维稳”思路而难有作为的情况下,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关键是当政者能不能打破体制内一统天下的思维定势,真正敢于从民间借力。

历史已经证明,局限于体制内的政治教育、政治纪律等政治手段,难以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难以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口号)。以互联网登上媒体舞台的1999年为例,当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3次全体会议上重申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当年3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但郑重其事的四大纪律,轰轰烈烈的“三讲”,都未能有效遏制党内、政府内的贪腐和不作为。在党内不正之风犹存、依法治国尚未有效落实的情况下,过多地寄希望于党员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不现实的。

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 and 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

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折不扣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

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二十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范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更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



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培训班上,勉励领导干部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这是以四川震后堰塞湖的威胁为警示,重提了中国的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两千多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一再被历史所证实。《中国记者》杂志曾经刊出新闻研究专家的一个结论,这位专家通过对强国论坛的研究指出,网络论坛等互动栏目可以起到民怨消声器的作用。这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思。

## 网络管理和引导需要眼光和胸怀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引出网络管理的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根据 CNNIC 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 30 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 68.6%,超过 2 / 3 ;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 39%,专家相信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上世纪 40 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根据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你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不能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黑砖窑事件中的“中原老皮”,厦门 PX 事件中号召“散步”的短信原创人,汶川地震中的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中率先报道“史上最牛学校”——希望小学无一死亡),以及作家余秋雨在博客上告死难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其巨大影响力,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感情波澜,都是传统媒体的一篇报道和评论所望尘莫及的。

党和政府如何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尊重

他们为民代言、批评现实、监督政府的权利,希望他们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

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党和政府的思想宣传工作来说,互联网是宣传技巧细腻和多样化的柔性平台,是社会舆论的调节和校正器,因而成为民心的凝聚和共振器。

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要求,总结汶川地震中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总结今年拉萨骚乱报道不及时、国际媒体公关被动不力的教训。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要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网络新媒体提到与主流媒体一样的高度重视,体现共产党对舆论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切实保障网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能再动不动就干粗暴地封网、抓人的蠢事了。

“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新成果,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在新的一年里,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欢呼“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萧 徐)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再说“孙大午案”

• 王建勋

##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你的丑陋  
代表着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  
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理解你  
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我愿意你十全十美  
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不能改变  
我就是我

孙大午

2008年8月23日

孙大午的这首意见诗,是我在他成诗一个月后的一次午饭上听他朗诵的。这个易水河畔 54 岁的刚烈汉子,酒后更显豪迈与悲怆。其时,站得笔管条直的身躯微微发颤,两只大手紧紧按住桌沿儿,脸向上翘,被血色涨得通红,眼眶中的泪逐渐盈余,又顺颊而下,吧嗒吧嗒地砸在塑料桌面上。他旁若无人地尽量发泄着自己胸中长期郁结的愤懑,声荡四壁,干云裂帛。此情此景,正应了那句老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5 年前的那场官司并没有改变孙大午的人生信条,现在他依然固守着“我就是我”。

## “少接触媒体”

2003 年春天,正当全国人民与“非典”恶魔和企图遮掩它的人祸进行殊死搏斗的当口,孙大午祸不单行,比绝大多数人更下了一层地狱——关进死刑犯牢房。157 天后,2003 年 10 月 30 日,孙大午被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金三十万元。

“(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二、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11 月 1 日,孙大午终获自由。4 日,徐水县委副书记率县长、县政法委书记、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公安局局长、县人行行长等一千人宴请孙大午。这位县委书记的祝酒辞是:“……大午,给你提三点希望:第一点,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次对你的诉讼;第二点,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

诉讼的这些人 and 单位,今天告你的人、抓你的人、批捕你的人、判你的人都来了……第三,希望你回来以后继续把企业搞好,少接触媒体。你接触媒体,你说你有罪,个人形象不好;你说你无罪,政府形象不好。”

这位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大棒”后的“胡萝卜”中为什么如此忌惮新闻媒体呢?45年前,毛泽东跑到徐水县大力宣传、推广他的人民公社,如若没有《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推波助澜,默默无闻的小小徐水县怎么能从全国近2000个县中脱颖而出、一步登天呢?其影响延宕至今——在政治学、当代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论及人民公社时,徐水县的贡献可谓大矣,功不可没,时常被论者提起。孙大午的出狱,也与新闻媒体的关注不无关系。这位县委书记在“孙大午案”的社会较量中,一定切身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否则,他不会在那次惊悚宴上口出此言。

11月11日,“孙大午案”一审判决10天后,因事先与法院达成协议,孙大午放弃上诉,“判三缓四”的“缓刑考验期”开始计算。这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曾子墨小姐跑到大午庄园来对孙大午进行采访,随后制作的两集节目《逃出囹圄的孙大午》在该台播出后,社会反响不小。我在看了曾子墨的节目后,曾请一位电视编导转达我对这位新闻后进的敬意,并把这两期节目内容临时插入我的讲义中,讲给学生们听。从2003年5月27日上午孙大午被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设计骗到徐水县城鸿雁大酒店被捕开始,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学术界各方人士纷纷不平则鸣,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奋起声援。自7月2日《南方都市报》和《新闻周刊》进入大午集团采访始,《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南风窗》、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以及《澳大利亚人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法国解放报》、《华盛顿邮报》、挪威国家广播电台、《悉尼先驱导

报》、《今日美国》等众多国内外新闻机构先后涌进大午集团,把现场抓到的第一手新闻素材编发出去,传遍全球。新媒体的新浪、搜狐也从网上及时跟进。这些平面和立体媒介的强烈关注,仗义执言,其立场和倾向自然与徐水县当局不同。我不知道这些来自外界的呼声,对几个月后的“判三缓四”影响力占几成,但肯定在那位县官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他对媒体的惕怵也不会如此强烈了。新闻媒介对执政党的监督由此略见一斑。这是一个大题目,也不是本文主旨,且按下不表。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上节节引的“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书”中,给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坐实的罪名是“……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3年9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向徐水法院提请的“徐检刑诉(2003)110号起诉书”中,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提起公诉的罪名也是这条,一字不差。

“中国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徐银移字(2003)第1号移送案件通知书”中,提请徐水县公安局对大午集团“依法立案侦查”的也是同样的罪名——“我支行初步认定该公司涉嫌变相吸收公



孙大午于2003年11月2日出狱



众存款。”顺便提及,徐水县人行的这份“移送案件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赴“鸿门宴”被诱捕的时间正是这一天的上午10时许。徐水县的两个科级单位在“孙大午案”的衔接处理上,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内中蹊跷,耐我寻味。

徐水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和该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所谓大午集团“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实在荒唐。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第六条明言:“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进一步具体明确了这个“4倍说”:“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从徐水县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大午集团财务部门与大午集团职工及周边村民签订的1627单“借款凭证”和“借据”中,大部分利率都是央行贷款利率的1倍多,没有超过2倍的。那么,在徐水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前引的徐水法院判决书中,为什么都在“高于”两字后面不约而同地避开具体倍数不谈呢?法律文书,人命关天。两个县级执法、司法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同时在关节点巧妙地模糊处理,是主观故意,还是疏忽大意?把“法盲”这顶帽子扣在包括徐水县公安局在内的基层执法、司法机构头上,是令人不可理喻的笑谈,更何况那位主诉“孙大午案”的徐水县女检察长还会“荣获”全国十大杰出检察长的称号!

判孙大午和他的企业“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徐水县法院依据的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法的、并且在公序良俗中既合情又合理的民间借款区别在哪里呢?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什么为限?《刑法》第176条中关于罪名的构成要件并不像后面的量

刑那样表述得清晰明确,便于操作,我这个外行也没有查检到最高法的相应司法解释。孙大午从1985年集资一万元起家,在徐水县郎五庄村西一块叫做“憋闷疙瘩”的荒滩上,和他的夫人刘会茹胼手胝足、栉风沐雨苦干了18年,到2003年他入狱时止,建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企业、近2000名职工,一所3000名师生的大午中学,总资产2.3亿元的大午庄园。期间,孙大午没有从国有金融机构贷到过一分钱,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逐步发展所必备的本金和流动资金,都是靠企业自己筹措和自我滚动积聚起来的。在他的“自我滚动”中,有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如饲料公司必需的原料玉米,国家收购价是每斤7毛钱,大午集团却以每斤8毛钱的高价计收。对一些不急等现金用的农民,大午集团便以借或存的形式记账,一定期限后连本带息一起偿还,偿还的年息是4.5厘,而同期央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年息是2.2厘。大午集团的职工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就靠工资和土里刨食卖点粮。大午集团的玉米收购价和借款年息都高于国家牌价,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当然愿意把玉米或玉米款借或存入大午集团了。非大午集团职工的周边村民闻知这个好消息,谁又不想多吃口肉呢?企业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淌入了孙大午的口袋里。趋利性是动物本能,人更是如此,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孙大午和他的企业靠着自己善良本性长期形成的牢固信誉,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大午集团公司也由此得到了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流动资金。如此两全其美的互惠互利方式,却被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

本节小标题还是引自徐水县人民法院对“孙大午案”的刑事判决书中。

现代社会成熟、稳定的标志之一就是秩序。与我国其他行业一样,金融秩序的逐步建立与稳定运行,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维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稳定社会大局的重要前提。金融秩序的构成,除了现有的各级各类大小银行和国家颁布的

金融法规外,公民之间的私人金融活动和民间约定俗成的金融交易方式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金融秩序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因民间金融运转的草根、粗糙、分散和势单力薄就忽视它,直至野蛮打击、粗暴压迫。也不能因民间融资出现了诈骗,就把它列入取缔之列。就像不能因国有银行近些年来屡发不止的内部金融犯罪,就把它停业一样。

基于此理,“孙大午案”的所谓“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就是“欲加之罪”的“何患无词”了。

首先,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借款,是它迫不得已的赔本买卖。我说它“赔本”,是指付给农民的利息高于国家银行的1~2倍,说它“迫不得已”,是指如上一节所述,孙大午在2003年案发前的18年里,不是没有企图向国有银行贷款,却因手续繁杂、条件苛刻,从未成功。大午集团的饲料公司,有一次购买玉米,恰逢一单价格合适的,但人家要现金。饲料公司筹措后尚缺100万元,于是,饲料公司的人手持一张大午集团在徐水县农业银行存有200万元的定期存单去跑抵押贷款。农行却说,这张存单差3个月才到期,如欲质押,须你孙大午全家每人签署同意意见,然后再经大午集团董事会每个成员签字,我们银行的规定就是这样。孙大午搞企业,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他有过人的精明。锱铢必较是每个商人必备的性格要素。孙大午他不知道向公司职工和周边村民借款要付高息?他会算不清200万元一年的息差一倍他要多掏4600块?两倍就是九千二?而这仅仅是大午集团下属十几个企业之一的饲料公司一年几十次进料中的一次。当然,孙大午的这类赔本生意,客观上造福了一方,施惠于百姓。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主流金融秩序不容纳的。

其次,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借钱,规模不大,数量有限,比例适中,有借有还,而且完全是用于生产性经营。徐水县人民法院对“孙大午案”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13083161元,涉及611人……”。1308万元的借款,对一家总资产2.3亿元(未经相关权威机构评估)的企业来说,负债率不到6%,比例不大,实属正常。这1308万元借款,且不说对全国、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就是

对保定市、徐水县的微观经济,也构不成“扰乱”,更谈不上“严重”。

种禽公司是大午集团下属的主力创利单位。1985年孙大午就是靠养1000只鸡、50头猪起家的。种禽专家宫桂芬经过20多年选育培养的京白939原种鸡,当年国家曾拨款2000万元给北京原种鸡场,结果打了水漂。孙大午投入300万元就把它搞成了,买断后更名为大午京白939,畅销15个省的106个县。1995年,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后被选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2005年,孙大午在大午庄园首倡成立了全国养鸡联盟。2007年5月,他成为这个民间组织的盟主。且不说整个大午集团,仅就它下属的这个种禽公司而言,把民间的散闲资金相对集中起来完成一项高科技项目,怎么就“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更何况这1308万元借款还是整个大午集团“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徐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陆续借的。孙大午和他的集团公司不但没有扰乱什么秩序,反而在为安天下、稳民心,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向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靠拢等方面做出了良性探索。孙大午的经济实践,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们先后依靠政府拨款和外国财团资金搞的乡村建设更贴近实际,更为成功,因而也更具有在我国北方农村推而广之的典型意义。

再次,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长期筹款并且成功,是因为债主们相信你孙大午和大午集团既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孙大午家世代祖居徐水县郎五庄,1954年他出生在冀中平原的这块碟形洼地上。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的徐水县志把郎五庄写作“狼虎庄”,当地人叫它“狼窝庄”。狼虎也好,狼窝也罢,是说百多年前当地居民狠勇、剽悍?还是指自然环境的荒蛮、凶险?无考。华北农村,民风原本淳厚,至今仍有绪风流韵。农民愿意把钱借给孙大午,除了本节前面说过的利息高这个原因外,债主们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基于这样两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孙大午和他的父母、弟弟们的人品乡亲们信得过;孙大午和他的公司团队的业绩街坊四邻无人能敌。2003年“孙大午案”爆发之前的18年,人们之所以陆续把1308万元借给大午集团,目的非常直白——为了钱生钱。因为无论存在国

家银行还是自己去干,都不如借给孙大午获利高且稳。2003年“孙大午案”案发后至今的5年,大午集团的职工和四邻八村的人还在给大午集团继续“输血”,难道他们都疯了?民风淳朴与呆傻可不是一回事,孙大午也没有赵本山式的忽悠能耐,但这个政府法办过的“坏人”,法院镇压过的刑余分子,成百上千的庄稼人就是相信他!在“孙大午案”中,中共徐水县委的赫赫权威,县人民法院代表的法律尊严,在农民的眼里一钱不值。农民用无言的有效行为,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郑重选择。扩而大之,如果中国各级政府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能获得他们治下的百姓信任,一言九鼎,一呼百诺,社会大局还愁不稳定吗?

最后,所谓“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反映了当权者、司法人顽强保护金融垄断的决心和意志。而这种偏狭和执拗是与前不久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法理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与沸腾、鲜活的经济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有些年头的老话题了。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它的重要经济支柱;而20多年前异军突起的私营中小企业更是占据了我国企业的大半江山。我国国家金融机构对私营中小企业的傲慢和漠视,是传统意识形态对金融业强行侵入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一天不启动,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单一和服务质量低下就一天得不到改善。以“孙大午案”为代表的、广泛活跃于民间的所谓“非法”金融市场,

准确地反映了广大私营中小企业主和无数储民对现行金融垄断状态的强烈不满。金融垄断下形成的金融秩序,已因它的低效率、不专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阻碍。前几年国有银行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的呆坏账,人为剥离后仍不能持平,再由国务院拨款几千亿元去填陷。前不久,在美国黑石公司、“两房”等案中,中国损失了多少亿美元?刚刚在美国金融海啸中,又有中国的多少亿美元不见了?至今没有看到央行、银监会或中投公司的谁站出来予以说明。难道这些“败家”行为不是对我国金融秩序的严重干扰?美国政府上个月对它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交付参众两院去决定。我们呢?前些年在国内进行重大金融项目投资时,事先没听说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审议,恶果造成后也没有问责制的惩罚,却偏偏抓住一个并没有“窃购”的孙大午来“诛”,本末倒置了。

## 几点思考

5年前的“孙大午案”,当时曾闹得纷纷攘攘,几成国际新闻。5年后,当事者双方和当年厕身其间的各方人士表面上都归于静寂,各自埋头干自己的事去了,“闷声发大财”。实则不然。改革开放30年来,围绕“三农”问题累积的诸多矛盾,已到了如上个月山西襄汾尾矿库发生溃坝前的危急当口,而孙大午和他的“大午模式”对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极具参考、借鉴和研讨价值。

### (一) 孙大午的“血”论。

当铺、钱庄、银号、账局和票号,这些我国历史上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它们存续和辉煌的时候,吸收吐纳了大量的民间游资,特别是农村的闲散资金。直到清末民初被欧美银行挤垮为止,它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它们的余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北农村,曾存在一种叫做“爆股”的草根金融组织,其运作形式,与现代股份制银行颇为相近。孙大午说,



2005年11月14日孙大午与卖玉米的农民合影



他小时候听他父亲孙凯说过。孙大午认为,这种把农民的钱相对集中起来,又反作用于农民、农业、农村的形式不错;而如把钱存到国有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将被输往城市了。2006年4月15日,他在中国农大的一个论坛上说,“农村信用社、合作社,实际上是国家金融从农村吸取资金的渠道,有虹吸效应,起的是抽水机的作用”。写此文的前一个月,他更为偏激地对笔者说,这是抽农村的“血”,给城市“输血”,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城乡差别的鸿沟想填平?门儿也没有!他的统计是:“农村不缺资金。以河北省为例,全省农村存款有2000亿,河北省约有5万个村庄,平均每个村庄存款就有400万,但这些钱大都用于建设大城市了。”孙大午是一个极固执的人,他的这番“血”论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12月14日,他在中南海就完整地表达过了。那是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的一个研究如何开拓农村市场的会上,他疾呼:“应该重新认识农村的民间借贷,让农村、农民有一个自己‘造血’自己用的机制。这样,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

“自己用”,是把“血”留下。孙大午的“造血”、“留血”认识,是他从23年苦心经营大午集团的艰难岁月中琢磨出来的“血的经验教训”。为此,他不惜以身试法,“虽九死犹不悔”。其志可嘉,其行却大可商议。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就是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日新月异,鼠标一点,黄金万两。世界金融市场的日趋集成化,在这次从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看得更清楚。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和眼光的企业家,应该放眼国际金融领域,纯熟运用现代商业会计技巧,合法地谋取最大收益。孙大午创业23年来,既然从国家银行贷款不到一分钱,为什么不越过它利用其他的时兴融资渠道呢?比如上市,你孙大午前些年为什么要拒绝呢?对股票和基金,孙大午也嗤之以鼻;对粮食期货,孙大午则可有可无。孙大午和大午集团“造血”的手段,仍沿袭着他的父辈们“报(爆)股”的传统方式;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包括所谓专家在内的我们,对它们的初始面貌和游戏规则恐怕连“盖头”都还没有挑起来,更遑论登堂入室,执子之手了。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又是一个大题目,以我的知识储备,本不容置喙。之所以在这里

蜻蜓点水地妄言,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主要的是待以“引玉”。

(二)“龙王不下雨,为什么不能就地打井抗旱?”

这句话是孙大午说的,背景是当时我和周密、徐庆全等人正在他的办公室讨论民间借贷问题。中小型私营企业融资难,是个陈旧得快要发霉的老话题了。今天,它仍在朝着霉变的方向继续发展。

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人尤努斯,因其长年坚持给印度穷人提供小额贷款,2006年10月获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行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控股银行是不屑与为的。农村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国有大型企业和资本雄厚的外企面前,与自然人中的穷人一样,也是穷人。这两类穷人因生活、生产急需,又从国家银行借不到钱,高利贷和地下钱庄一类解放后消失了几十年的地下金融品种和经济组织才因利乘便,应运而生。一般经济学中的供需均衡律再显神通。改革开放30年来,高利贷和黑钱庄屡禁不止,剿而不绝,而且越是在经济繁荣的地方,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这个反常的社会现象很值得金融、法律和社会学的专家研究。难道是那里的企业家和普通百姓太愿意受剥削了,还是相关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表现在金融上,就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成本构成之一,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调节供需关系大致接近平衡。无论是国家、企业或个人,他们的任何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高低都是和潜在的风险成正比的。用风险大所以收益高这个基本生活常识衡量,所谓高利贷,也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了。高利贷的“高”上限在哪里?地下钱庄的“黑”或“白”又以利息的多少来划线呢?本文第二节中援引的“4倍”规定,实在不应该成为削足适履的“刀”。中共中央从1982年到1987年,连发的6个“一号文件”里,还有那个“非公经济36条”中,都说要“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地下钱庄是私人所有制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上,应该给它一个摊位。前几年,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种

金融类型的十几个金融机构,已被我国政府批准进入,现在又陆续开展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金融业务了。反观对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的地下钱庄,却是一股非赶尽杀绝不可的劲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洋人洋办法,土著则“露头就打”。我看不如换一种思维,采用大禹治水的办法去疏导,让地下钱庄钻出地面,露出头后不但不打,还要浇水、培土,予以扶植和规范,“施肥”则不必了。规范大致是:“4倍”这个上限可以稍稍提高一点;再用向央行提交准备金的数额划几个台阶,限制它的省、县、乡、村的存贷范围,而信贷贷款和担保贷款的发放业务则不必予以限制,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必作为发起人或出资人硬掺合进去;准入门槛不要太高,最低一级经营范围的二三十万即可,等等。这些粗略构想,仅仅是我这个门外汉写此文时意到笔至的肤浅臆见。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民间钱庄不要干涉太多,你在改善目前的服务质量,替亿万储户理好财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你的主业。

### (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同志一言九鼎,马上使一部分人的钱袋立竿见影地沉重起来。但在先富起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以及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带动全民富裕的问题上,在改革开放前期,认识不能说是清晰的。胡锦涛说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应是明确的阐释。不管先富后富、少富都富,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终于又有富人了,于是,为富人奔走的服务业也攀援其上,日见蓬勃。北京有一个地产商坦言,我就是专为富人盖房子的。孙大午凭着他的聪明、能吃苦和敢于冒险,如今也算富人了。但他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是被工作队划为贫农的,同时还无偿白得了地主的25亩耕地和一口袋麦子。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今年91岁了,耳不聋眼有点花,老人家的长寿、健康,得益于大半辈子任劳任怨,积德行善。60年前的赤贫人家突然天上掉馅饼,喜不自禁后又惶恐茫然,感到有些腰不直理不壮,这位不知《资本论》为何物的农村妇女,在喜获嗟来之食的当天夜里,就让自己的丈夫,今年也快90岁的孙凯背着那口袋小麦偷偷地还给了那家地主。孙大午成人后会就此事问过他妈,明理的老太太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好吃又要钱闹

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2002年10月里,爱琢磨事的孙大午把周围村庄里还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和一些老贫农、老长工请到他的大午庄园,让这些耄耋老人说说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坊间有一本《毛泽东自传》,说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毛家的长工们都有咸鱼片和鸡蛋吃,而毛和他的几个弟弟只能干看着,馋得直流口水。“仓廩实而知礼仪”。此书若真,看来少年毛泽东的家仓廩还不太实,小主人们长年难得荤腥,成人后礼和仪也就不大晓得了。而现在仓廩实的孙大午却对若干为富人制定的“礼仪”大不敬,维护“礼仪”的专政制度当然也就不见容于他这个反叛者了。这是5年前“孙大午案”的死结。

## 五、结语

2003年的“孙大午案”,一度曾使得风风火火、热气腾腾的大午集团当年亏损580万元。大午集团从1985年到2003年,年年盈利,2002年的利润是980万元。好在孙大午没有被这场无妄之灾打垮,2003年11月1日他出狱后至今,精神状态不减。他把自己、家人和大午集团干部、职工蒙受的耻辱强咽下去,用这5年的实绩,延续着企业的辉煌。近2000名职工的队伍不散,3000名师生的学校不垮,死心塌地地跟着孙大午“蒙着被子跳井”,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信任。孙大午被关在徐水县看守所的时候,徐水县抽调了40多人组成工作组,带着一支500人的防暴队,进驻、接管大午集团各公司,号召农民配合工作组揭发、检举孙大午的违法行径。大午集团的财务部门首当其冲被查封,保险柜里的300万元现金和图章、账本被抄走。可是农民却不吃这一套,仍然源源不断地把玉米送到饲料公司的场院上。工作组成天用大喇叭向村民广播讲宽严政策,宣扬孙大午“非法集资”的罪行,并威胁说:你们如果还坚持说是自愿把钱借给孙大午的,那这钱就不还了!还刑事拘留了张庆余等三位竟敢为孙大午说话的大午集团员工。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冯庄村民王瑞英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政协报》记者说:“我借给了大午公司20万,人家打了借条还犯法吗?等大午出来,我有钱

还借给他,这回还不打借条了,口头协议,还犯法吗?”

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我曾听郭宝昌讲过他家先人曾一度卖房子卖地,甚至砸锅卖铁来应对误信谣言的挤兑风潮,后来他把这段家族史写进了他的《大宅门》。

大午集团现有土地 3000 亩,大部分是用“租借”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流转而来。大午集团食品公司经理刘宝坤,他家有 15 亩责任田,位于大午中学北边。他把地租给大午集团,地租是每年按亩产 600 斤小麦和 700 斤玉米计,年底照时价付。刘宝坤在公司上班挣工资和奖金,他的 15 亩地不用再流一滴汗,也不怕旱涝虫灾,每年坐收租子就是了。孙大午用这样的办法,和众多“小地主”们互惠互利、相安无事 10 多年了。孙大午说,只要现在的国家土地政策不变,我与村民的租地协议也不动。依我陋见,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毛病和说道的,今后如有可能,我再另文讲它。

“孙大午案”,先以“非法集资”立案,后也以此结案。任何新生事物,在它刚露头的时候,大都会与时人的惯常认知和现行制度相冲突。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组成以后的 28 年里,因其宗旨不与世合,不也是被国民党定为非法,并以武力围

剿的吗?30 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勇士”冒死按手印的壮举,对抗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制度经济学中有“交易先于制度”一说,法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任何法律永远落后于社会实践”。5 年前徐水县当局秉承上意对“孙大午案”的宣判,如果没有案件以外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诱因,现在改判,正当其时,借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坡下驴,体面又风光。

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多次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反省、道歉并给予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经济赔偿。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在波兰向二战时受迫害的犹太人“高贵的一跪”。美国政府也对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人公开道歉。罗马教廷对 600 年前教会伽利略的审判予以纠正;英国圣公会今年 8 月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 150 周年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初的驳斥错了。这些公开悔过者,与“从不下罪己诏”的人比较起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孰荣孰耻,泾渭分明。希望“孙大午案”早日有个公正的了断。奢望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冤案不要继续“淡化”下去了。

(2008 年 11 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广 告

##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 110 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 3003 米,井底水温 62℃,出井水温 56℃,日出水量达 1200 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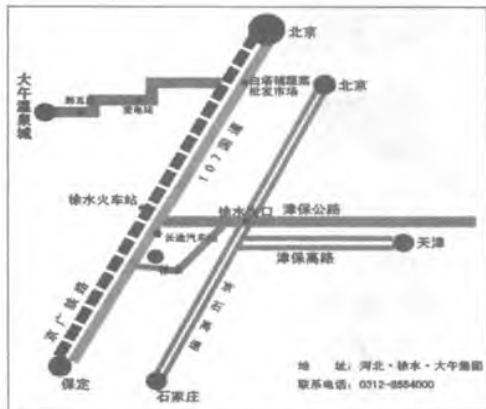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 60 元,温泉佳宾馆标间 280 元(含温泉门票 48 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 107 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 5 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 5 公里、距保定市 25 公里。保定市 12 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 李海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 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 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 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

## 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

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毛泽东的批示可能康生当天就从电话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办印厂印刷，再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是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虽然毛泽东对张恩慈的报告有批示，康生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才敢动作。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组的任务灵活，可大可小，不引人注目，名正言顺，可进可退。因为事关机密，组长就是曹轶欧。还是家人最可靠，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跑外勤，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

##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1日，政治局第一次大会之后，中央让谢富治通知彭真不要再出席会议。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按毛泽东的批示办，不能再坚持原有的看法。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曹轶欧由幕后走到前台。康生很谨慎，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大学纪事》第642页）

曹轶欧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重用他别人无话可说；二，张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头熟，关系多。他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一时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哲学系左派很想从他那里听到中央动向，政治局会议情况，当时，《五一六通知》还没有通过，张恩慈不可能预卜先知，向他们介绍“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按常理推测，介绍内容主要是他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印发的情况。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得到印证。杨克明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在研究大字报内容时，聂元梓提议以写北大社教为主。

估计张恩慈还要左派注意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告诉左派“高炬”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何明是关锋的笔名。这两篇文章已有不少五一六通知的信息。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我们在农村四清都知道了，当时传为“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就够振奋人心的了。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青年人思想解放，他们不仅想写文章，还要贴大字报。

5月16日之后，张恩慈与他们的谈话内容

才会涉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五一六通知》规定传达到县团级。在此之前,康生、曹轶欧不会泄露机密,因为泄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张恩慈在曹轶欧授意下,告诉宋一秀、高云鹏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告诉杨克明,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北大有众多外国留学生,这些情况很快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匡骗李雪峰到北大讲话。(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安抚、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从张恩慈手中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6月1日中午,毛泽东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在电台广播,康生才松了一口气,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康生会如此紧张?

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组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高云鹏问:“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有两个原因:其一康生、曹轶欧布置是写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瘦死狱中。但是,张恩慈也没有断然反对,左派受到鼓舞。这种话说到三分就可以了。双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认为这是1957年右派的作法,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这与哲学系左派的思想基础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说:你所举纪律严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发后,情况大变,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有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叫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

私自公布《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那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张恩慈如不是奉令,绝不敢如此行事。

## 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佐证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2005年聂元梓出了一本回忆录,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杨克明说,那就找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贴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

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曹轶欧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当然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是巧合。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个“他们”包括张恩慈在内。康生没有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

## 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杨述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采访吴传启)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书,我们系在大饭厅听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为什么40年来我一直记得这场报告?因为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月25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互相间有肢体冲突。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这张大字报的命运戏剧性地变化,人人关注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是谁让写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谜底,所以印象深刻。

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我在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一书时,特地收入了这篇文章。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说他要在这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

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写大字报的7个人很快分裂,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张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采访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张大字报的事作罢。当时正在批判四人帮,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烧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时,张恩慈曾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会引起全国大乱,绝没有想这场火会烧10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 2009年第3期目录

|      |                                                                |                          |
|------|----------------------------------------------------------------|--------------------------|
| 书屋讲坛 |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br>说说“普世价值”风波<br>——兼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          | 崔振椿<br>肖雪慧               |
| 史海钩沉 | 从两件文书透视百年泪水<br>向党、向人民请罪<br>不识庐山真面目<br>——“文革”时期作者的署名            | 黄全彦<br>李慎之<br>胡松涛        |
| 灯下随笔 | 和谐与伪和谐<br>从一元到多元<br>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br>牛年说牛                          | 戴立勇<br>赵进晓<br>钱理群<br>徐 康 |
| 说长论短 | 岂能漠视思想之火?<br>——与赵俊贤商榷何谓“顾准现象”<br>胡编乱造忽悠读者<br>——评于丹所谓孔子的“天地人之道” | 贺越明<br>程亚林               |
| 书屋品茗 | 古今怀怀 山水清音——《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杨福音》<br>读后随想                             | 鲍吉尔·原野                   |
|      | 读书人说<br>俯仰之间<br>庞巴尔(Pomba)不是人名,是地名!                            | 侯德云<br>鲁小俊<br>姚越秀        |
| 思史佚篇 | 重温“打倒孔家店”<br>贫窶者得势以后<br>——重读民初“四张”<br>毛泽东的军事化管理                | 柳士同<br>顾 土<br>袁 刚        |
| 人物春秋 | 钱钟书与侯外庐<br>——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一封信                                       | 龚 元                      |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3.00元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 410007  
电话 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 0731-5790197  
邮箱 nlh5314@263.net

#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 钱江

##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提出报告当天,人民日报即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具体负责,抽调韩青、韩进玉、赵文政、姚伟、田永有等人组成工作班子。第二天,上述人员集中到一起,学习文件,统一认识。

从当时情况看,报社同志基本上都欢迎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但也有不同反映,有人认为“右派帽子早就摘了,还有什么可改正的?也有人担心这么搞会不会否定“反右”成果。个别人还犯嘀咕:“反右”运动是毛主席发起的,我们给改正了,以后再有运动我们怎么办?

工作班子讨论了起来。赵文政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错划成右派的人,即使过去了20多年,也应实事求是地给改正过来。这并不是否定“反右”斗争,否定的只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这个认识,大家都比较认同。

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随即开展起来。首先是确定工作对象。大家翻检20多年前的材料,发现当时处理得相当粗糙,归档很马虎,档案中连一份完整的被批斗、“划右”者名单都没有。只好分头翻箱倒柜,在1957年和1958年的工作简报和计划总结中寻找,姜汉鼎还找来了当年“反右”的有关书刊,结果从中查检统计出,报社当年一共划了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从“右派”中转划)。株连所至,他们的家庭子女乃至朋友故交都遭受了很大痛苦。

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右“成果”是:1958年4月2日,报社划了24名“右派”蒋元椿、刘衡、刘时平、刘晓晞、苍石、林安乾、杨建中、李右、沈同衡、裴达、林钢、吕建中、孙乃、陈国安、方达、胡平、赵克惠、张光华、朱克潜、蒋如荃、张恩铭、张宝义、田兰坡、杨春长。不久后增划8名黄操良、季音、钦达木尼、习平、刘群、高粮、赵恒良、胡骑。另外,工厂将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这些人中,除黄操良自杀外,有9人留在报社,23人遣散各地,其中大部分生死不明。

“改正”工作班子当即决定,对留在报社的“右派”,马上开始复查改正。对散落外地的23人,由韩青和韩增玉两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先去河南、安徽、上海、贵州等南方9省市,寻找遣散在那里的16人,着手复查。这16人占了遣送外省者的大半,余者由别的同志寻找。

## 赶赴贵州寻找当事人

挑选当年刚刚调进人民日报的两位政治部干部韩青和韩增玉,恰



得其人。

韩青当年42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做过侦查保卫和文字工作。他调入人民日报政治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记者部主任商恺得知他文笔甚好，就来政治部商量，要调韩青到记者部工作，但是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没有放手。

现在，又是姜汉鼎问韩青，你有没有困难？韩青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他亲身经历的大学“反右”运动情景：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了些对农村统购统销不满的话，一个同学说起他亲眼看到苏军在我国东北有野蛮行径，结果这两名同学都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学籍。更离奇的是他所在学院政治教研室支部书记，前一天还在领导“反右”，第二天也成了“右派”。原来按照“划右”比例，该室还差了一名，于是这位支书就说自己有同情右派言论之处，把自己上报为“右派”，上级居然就批准了。韩青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荒唐的，应该纠正。因此，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改正”工作。

这年45岁的韩增玉其实是《人民日报》的老干部。1948年《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里庄创刊不久，他就在村里投身革命，当上了报社通信员，进城以后曾任总编辑邓拓的警卫员。后来因国家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需要，调到二机部从事保卫工作。此后几经调动，“文革”中到北京工业大学继续做保卫工作。前不久，他听说《人民日报》要迁往新址，就回来看望老首长安文一。安文一得知韩增玉孩子多，住房狭小，就要他“回报社”工作，说将来房子会有的。于是韩增玉在1978年春天回到了“老家”——《人民日报》这个熟悉的地方。

在邓拓身边深受教育，为老首长的“文革”遭遇深感不平，韩增玉从心底里拥护拨乱反正的好政策。此时风云际会，反右改正就成了韩青、韩增玉来到《人民日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们深深地理解，蒙冤受屈20年是多么漫长！一旦大致打听到了受屈人员的下落，就决定马上出发。早复查一天，就能早改正一天。

10月22日清晨，韩青、韩增玉登上去贵阳的飞机。

第一站去贵州。他们已经了解到，报社有4人被遣送古夜郎，都到边远县城。抵达贵阳后，他们直奔省委组织部了解人员去向，得知胡平在安顺

地区，刘时平、蒋如菴夫妇在赫章县，还有一位赵克惠不知下落。

他们决定先从找胡平入手。第二天来到安顺后，才打听到胡平在晴隆县，去那里要坐长途汽车，而次日的长途车票已经卖完了。好在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帮忙，弄到了车票。第二天，他们在长途汽车上整整晃了一天，才来到黔西南的晴隆。下车后先在招待所住下，即赶到县委说明来意，这才了解到当年县委已将胡平安排到县农水局。

韩青、韩增玉满以为马上就要和胡平见面了，谁知县委与农水局联系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原来胡平早在1968年即死去了。那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段，性格倔强的胡平不能忍受屈辱，含愤自杀。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韩青和韩增玉就赶往汽车站，乘车返回安顺。在安顺等到午夜12:12分，坐301次慢车去水城，再改乘汽车去赫章。那是贵州的西北端，真正是古代“夜郎国”腹地。经过一番旅途劳顿，10月30日一大早，他们来到赫章县委组织部。组织部审干组的同志听说来者是北京的同行，十分亲热，马上介绍了本县正在开展的“右派”复查，随即带上客人来到赫章二中。从《人民日报》遣送的刘时平、蒋如菴夫妇都在这里任教。

赫章二中支部书记殷学昌介绍了刘、蒋两位老师的情况，然后把蒋老师找来了。原来此时的刘时平已得知北京开始复查1957年旧案，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赶往北京申诉去了。

看到了人民日报社来了人，蒋如菴心情激动，当即回顾了1957年自己挨整的全过程，对当年报社开会、发言，乃至组织的批判等等记忆犹新，说起来滔滔不绝。说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同时她也提供了赵克惠被遣送在贵州织金县的情况。

刘时平、蒋如菴夫妇被打成“右派”，是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最早出现的错案。

刘时平1915年出生在内蒙古临河县的富豪之家，中学毕业后于193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1937年冬天赶到晋北八路军120师师部，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刘时平前往云南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

刘时平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有突出表现。

1946年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

枪杀害了李公朴教授。不幸的消息传出，当时正住在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的刘时平闻风而动，很快弄清了事实真相。在昆明受到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刘时平只身前往上海，在《文汇报》上报了李公朴遇难的真相。

1946年8月，刘时平进入北平《益世报》当记者，当年12月24日晚上发生了美军士兵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又是刘时平，追踪调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写出《沈崇小姐》通讯，揭露了美军暴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引发了抗议美军的进步学生运动。

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突然秘密集中数万人马，在保定集结后向南突进，严重威胁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刘时平在傅作义决策的次日，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悉了敌人的计划，立即向领导报告。此情报使中共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南袭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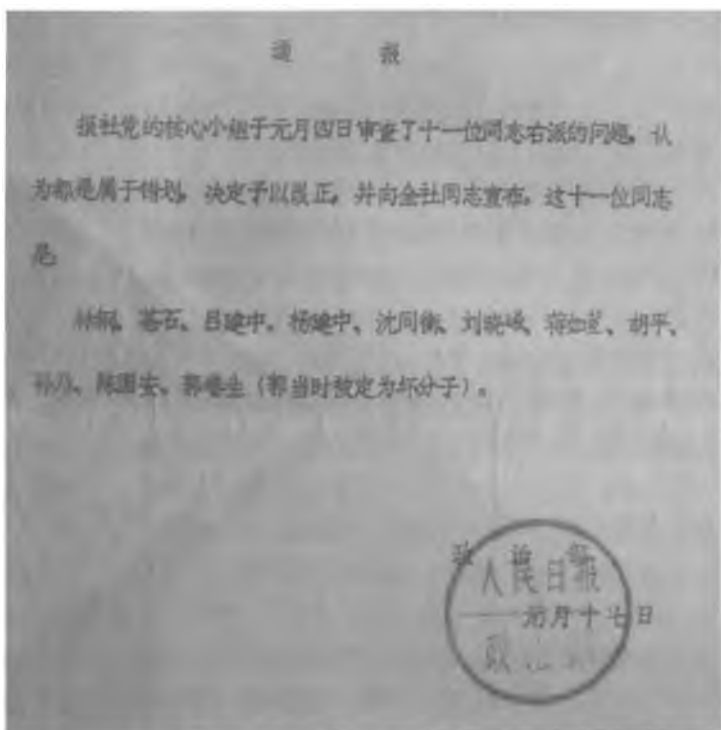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刘时平于1948年12月底被敌人逮捕入狱。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守机密不吐分毫。随后北平和平解放，刘时平即获释放。出狱后，他进入了《人民日报》的队伍，成为活跃的新闻记者。

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刘时平受到了无端怀疑和“逼供信”。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在云南工作时由于环境复杂，在约两年的时间里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原本定为11级的刘时平受到党内批评，被降了两级。

1957年春夏“鸣放”之时，受过打击的刘时平本已不再吭声了。但是妻子蒋如萱受到“鸣放”的启发，对刘时平前年受到的无端审查提出了质疑。

蒋如萱1926年4月生于昆明，1949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任报社业余学校副校长。没有想到，她很快受到批判，被归入“右派”行列。非但如此，还有几个组织方面的基层干部找到刘时平，要他揭发妻子。

刘时平性格刚烈，当时本不想再说什么了，但要他揭发妻子，却使他再也按捺不住，生气地说这是“瞎整人”。结果，记者部运动负责人“新账老账一起算”，将刘时平、蒋如萱夫妇双双打成右派，发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批改正右派11人名单

配农场劳动后又一起遣送古“夜郎国”，当起了中学教师。

“右派”生涯是极为痛苦的。“文革”卷地而来的时候，刘、蒋夫妇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但是，他们对生活依然充满信心，认为尽管浮云蔽日，终有云开复见天的时候。果不其然，千里万里外的报社终于派人找他们来了。

听着蒋老师诉说20年的艰难，韩青、韩增玉唏嘘不已，安慰她不要着急，现在中央已有文件，我们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

蒋老师听了，千恩万谢而去。第二天，她又来到招待所，拿出了刚刚收到的刘时平自北京拍发的电报：“萱 我已三恢复。平。”

连带标点不足10字，不但使韩青、韩增玉看到了这对几十年患难夫妻的深厚感情，更让他们感觉到报社复查工作进展很快，促使他们加快复查速度。他们对蒋老师说，你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往回返，你不用回北京了，就在这里听消息吧。

根据蒋老师提供的线索，韩青他们与织金县委联系后得知，赵克惠原在县五金公司，后改做教师，为照顾夫妻关系，已于1976年9月8日调往河北乐亭县工作。

韩青于当日即用长途电话报告报社，建议报

社另派人去乐亭联系。

## 转往江西和河南

离开贵州,韩青他们转向江西、浙江,于11月11日来到合肥。原先,他们只知道陈国安、林安乾、方达3人下放在安徽,具体地址单位不详,于是到省委作进一步了解。

安徽毕竟是东部省份,交通便利,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比较透彻。韩青、韩增玉敏感地发现,此时人们介绍起“右派”言行来,已经有很大变化。过去一说右派,马上指指点点,不是说人家思想反动,就是罪恶滔天,全是负面语言,提到优点也是“道貌岸然,伪装进步”之类。现在,人们的看法变化了。

安徽劳动大学组织部介绍陈国安的情况说,他是今年4月调来的,来后本想让他休息一下,可是他不休息,调来第二天就上班了,而且每天上班最早。来后让他在图书馆搞外文编报,他很热心,工作态度与人际关系都好。业余时间让他辅导全校的英文教学,他也很负责。陈国安对自己经历1957年的惨痛从不隐瞒,对“文革”是不满意的。因此,对陈国安,领导满意,群众反映不错。

听到这样的反映,韩青、韩增玉马上就判断,当年对他肯定是搞错了的。

接下来,他们赶往安徽白湖农场,又一次得知了令人痛苦的消息:被遣送在那里的报社“右派”林安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白湖农场负责落实政策的人员介绍,林安乾工作积极,已经当上了小组长,然而周围人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右派,即使摘了帽子,“摘帽右派”的名声还是挥之不去,有些人总是对他讽刺挖苦,百般刁难。“文革”风暴卷来的时候,30多岁的林安乾还没有成家,眼看面临新一轮的斗争,遂投湖自尽。说到这里,农场干部对这位惨遭不幸的新闻工作者深表同情,答应立即把档案材料寄给《人民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晞、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

在安徽调查之后,韩青、韩增玉来到河南,算

了一下行程,从报社出发至今已经35天。为尽早完成任务,他们决定由过去的两人同行,改为各跑一路。韩增玉费了很大劲从报社一位叫秦永的老人那里打听到张恩铭在宁陵工作,即赶往那里。韩青则先到河南大学寻找杨建中,即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写下长长一段文字表扬过的“向大人物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

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韩青在中学读书时就对亮出自己“红学”观点的两位“小人物”很崇敬,没有想到其中之一也成了“右派”。而且在1961年7月遣送河南的时候还没有摘帽。不过这位蓝翎终于在当年年底摘帽,几经辗转,待“文革”終了,他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恰好这天杨建中不在学校,河南大学“运动办”和中文系领导向韩青作了介绍。他们说杨老师信息很灵,11号文件还没传达他就听说了,55号文件他也比学校知道得早。组织上与他谈话,蓝翎说他的“右派”肯定是搞错了,要求甄别。上周他已写出正式材料通过统战部转送。现在面对《人民日报》来人,校人事部门当场答应,尽快把杨建中的档案寄往《人民日报》。

接下来,韩青为找到李右到驻马店空跑了一趟。地委对李右的情况不了解,只听说他现在确山县。到了确山,才知道李右回了郑州。韩青又赶回郑州,费了一番周折,才在一排低矮平房前见到了黑瘦沉默的中年人李右。而这时的李右,已经改名为李佑了。

韩青上前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还问老李对1957年问题的看法。老李自然不认识韩青,说话十分谨慎。这是韩青此行的又一个感受,经历了20年的蹉跎岁月,不管这些人当年是多么活跃,苦难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少语和沉默,是这个群体通常可以感知的性格特征。

接下来,韩青来到安阳,寻找那里在“棉花办公室”工作的吕建中。当地人都说根本没有这个单位。韩青继续打听下去,终于弄清楚,离开安阳四十里外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棉花研究所,正是吕建中所在单位。

韩青坐长途汽车赶去,这个所的领导给予吕建中全面的肯定,说老吕在那里主办《棉花》杂志,从人品到思想,从工作态度到编辑能力,都是好的。办《棉花》杂志,从组稿、编辑、纸张、校对,几乎



全靠老吕了。这位领导还说,老吕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也客观公正,在“文革”中因对江青表达过不满而受过审查。看来,当年把他打成“右派”是难以理解的。

韩增玉离开宁陵后,又去寻找了孙乃。他也带着当地对孙乃的肯定回到了郑州。

## 全部是错案,全部予以改正

韩青、韩增玉于12月2日回到北京。他们连续外出40天,所经大小城镇28座,总行程约1万多公里,找到了蒙受委屈的十多位同志,将他们的档案借回报社,为下一步复查创造了条件。

就在他们出差外地的同时,对留在报社的“划右”人员的复查已在进行并很快取得成果。其实,这些遭受了不公命运的老新闻战士,早已提出申诉了。1978年夏天,刘衡给邓小平和胡耀邦各去一封信,要求复查自己遭受的“右派”冤案。胡耀邦对刘衡的来信作了批示,转到了《人民日报》。他写道:“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这时,秦川

(上接77页)划为“右派”的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何等的简练!

不愧是法学教授的手笔,应该是受过书写法律文书的训练的!

这篇文章不是法律文书,但文章陈述的事实属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我们中国,政治书写的严重性更往往甚于法律书写的严重性!

我这些年来,“大而化之”,没有特别留心各级各类文件中有关“右派‘改正’”都是怎样落笔的,但凭我的直觉,在非正式文件中,在一般个人署名文章中,像这里的写法,是经过用心推敲的,因而也是合乎规格的。

我也便跟着推敲一回。却发现紧挨着的一句有些语病,并因而产生了歧义。

那一句是:“1959年以来屡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得到了平反;”请问,这里“得到了平反”的,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还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再加上至此依然认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上“分子”帽子的人以下,还有一档“犯有

已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在延安的时候就知道记者刘衡,很快派人找到刘衡,打算先摘掉她的“帽子”。

谁知刘衡的态度非常倔强,她说:“我从来就不承认我是什么‘右派’,你给我摘什么帽子?”她要求的是完全纠正错案。结果事情就僵持住了。直到1978年冬天,拨乱反正潮流涌动,僵局被打破,《人民日报》成为最早“改正”的单位。1978年12月8日,报社召开大会宣布:为黄操良(已逝)、高粮、刘时平、刘衡、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杨春长10人“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工作。

复查工作继续进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

(本文在成稿过程中得到韩青、韩增玉同志的热情帮助,采用了他们提供的材料,在此致谢。)

(责任编辑 萧 徐)

……错误”的人,例如文革期间,定下某些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定下一批叫做“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戴走资派帽子就是敌我矛盾性质,所犯不是“错误”,叫“罪行”,而犯……错误的人就归到“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称呼“同志”了。这区别不可谓不大,所谓“有区别才有政策”嘛。在反右倾(主要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那一次)中定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时,似乎也还定下一些“犯右倾错误的人”,我记不十分清楚了,因我当时自顾不暇,无心管别人头上戴什么帽子了。如有这么一些人在当时得免于“分子”之帽,会感到蒙恩宽大,但到了甄别平反时的语境中,如果分指“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对后者来说,可就算得是“留尾巴”,即虽然给你平反了,你可得记住,你是犯过“右倾错误”的!

政治用语跟法律用语一样,关系到“个中人”的升沉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可不慎欤!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几句,也不算过分絮叨吧。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

(外一篇)

● 邵燕祥

前几年,乍一接触“双规”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向一位媒体人打听,才知道指的是“在规定时间内、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或曰对调查所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我当时恍然说,哦,就是“隔离反省”啊,这是过去“组织上”审查干部的轻车熟路。

后来发现,每逢报道反腐案件取得进展,哪儿又抓出一个或一窝贪污犯来,都是先从有关人员被“双规”开始。这“双规”成了纪检部门的一个新式武器,至少也是一个反腐取胜的入口。

反对贪腐,吾所愿也,被“双规”的多半是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了,便想这是恶有恶报,甚至觉得应该“双规”的比已经“双规”的人数要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我敢说这种心理不是我所独有。虽没有经过民意调查,但对这个“双规”好像一般人并无恶感。

由于这种“双规”该是另有规章,绝大部分都是悄然进行的,不说秘密,至少也不张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进去了”,仿佛等同于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检察机关发出了逮捕令似的。谁去管它跟历史上的“隔离反省”有哪些异同,或是也有“双规”后宣布清白的呢(这是逻辑推论,实际上恐怕少之又少;有些被诬而致“双规”的,也往往不是很快能澄清的)。

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我们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无法无天,包括私设公堂、非法拘禁一类罪行。后来发现虽“拨乱”也还“反”不了“正”,因为许多做法其来有自,如在文革前,远的不说,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级党政机关都有权对所属人员搞“隔离”:另辟一室,不准回家,不准跟人联系,由保卫人员看押,轻者类似军队中的“关禁闭”,重者则如同监狱里的“蹲小号”。1952年“三反”“五反”时对

大中小额“老虎”是这么干的,当时还没有宪法;1954年有了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但转过年来反胡风、肃反运动中还是这么干的。至于文革,不过是登峰造极罢了。

然而,一般党政机关单位(或特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限制人身自由么?

这样一想,我们这里现在实行的“双规”办法,其合法性不是也颇成问题了吗?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不是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而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吗?

由党的纪委执行“双规”的范围,据说在某些地方已经由党内扩大到党外,由“干部”扩大到“群众”,成为“法外之法”(以至在个别地方沦为“生财之道”);但即使只限于党员干部,实施这种拘禁式管理,不也是于法无据吗?

我这些想法,朋友间有的赞同,有的却说:“双规”还是行之有效的,你这不是站到那些被“双规”、该“双规”的犯罪嫌疑人一边,替他们讲话了吗?没有“双规”,他们不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反侦查、串供、毁灭证据乃至灭口等犯罪活动吗,你这提法是要给反腐败设置障碍呀!

问题提得够严重。然而,还有什么能比执纪执法过程中越出宪法和法律的措施更严重吗?

“双规”也许有一定的效率,把对贪污受贿一类违法犯罪的侦察和预审“毕其功于一役”了。然而,如果不由党委纪委越俎代庖,取代司法部门的功能,我们的公检法就无能为力吗?或者说,党委纪委是党内的公检法,负责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刑事犯罪的审查和定案,国家公检法部门则只负责不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刑事案件——也许实际上是这么分工的,但最

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组织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吧？

前年在一次关于《中国反贪史》(王春瑜主编)的研讨会上,正好遇到几位从事党的纪检工作的朋友,我不怕人讥我外行,三言两语提出这个问题,说我对你们采用的“双规”本身的合法性表示质疑,不料他们不以为意,说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过云云,轻描淡写就过去了。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漫长道路上,我们可以算是刚刚起步,还有非法治社会的若干遗留并不足

怪。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哪些是应该在体制改革中逐步改掉的,而不是视而不见,任其迁延下去。

从“双规”办法的去留,对公务员违反政纪、违犯国法的审查处理,党的纪委对其中具有党员身份者的审查处理的交叉,到党的纪检部门与政府的监察、司法机关之间,在职责范围、工作程序和分工协作方面,涉及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如何理顺,如何定位,不仅是在反贪反腐工作中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在司法改革以至整个国家体制改革中无法回避的议题。



有一位法学教授写了一组通俗文章,其中有一篇《冲破“两个凡是”的法治解读》,回叙了三十年前的一段历史。所谓“两个凡是”,指的是 1977 年 2 月 7 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说,“由于结束了‘两个凡是’,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才得到真正的落实”,接着列举如下:

上世纪 30 年代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40 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1955 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得到了平反;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

1959 年以来屡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得到了平反;

“文革”中数百万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请注意,以上六句话缕述的六件大事里,有五句“得到了平反”(其中有一句没用“冤假错案”字样),夹着一句“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看来,性质和做法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此文以前,我自然知道:几十万“得到了改正”的“右派分子”,从 1978 年至今的三十年间,都只称“改正”不称“平反”,因此后来某些人

口头上就称这一部分人为“改正右派”,犹如曾经称什么“摘帽右派”一样,继续形成一种人格侮辱,虽然这不是当局所明文要求的。有些当事人想不通,便寻找这样命名的理由,但也从来没找到过官方的解释。只是据传,在 1978 年一次几个部委联席会讨论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时,听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指示,大意说“反右派斗争不搞甄别平反”云云;又据传,邓小平针对这一“两个凡是”的主张,没有正面顶撞,而迂回说,不是平反,是改正错误结论,于是,所有被认为属于“错划”的前“右派分子”之得到“改正”,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时的灵活策略,这样,把“改正错误结论”作为对几十万人的“个案处理”,从而避免在整体上把反右派斗争称为“冤假错案”,也完全符合邓小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一基本立场。

因为当年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错划”,现在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改正”,虽为数达几十万起,但终究都是个案,不涉及对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一人一案,要么是冤案,要么是假案,要么是错案,不可能同时是“冤假错案”。所以行文时,不但不必提到当时笼罩了几十万人命运的反右派斗争,并且,也不必提到“几十万人的冤假错案得到了改正”。一句“1957 年被错(下转 75 页)



# “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 张绪山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

**实例一 傅雷之死。**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原罪”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 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但三呼“万岁”之举，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实例三 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 张志新之死。**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朝着东方。……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文革时期“革命”文艺作品塑造的英雄就义前的典型形象，也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就像人们在兴奋时

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样，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站在当今的视角，以历史学家的理性回眸这一幕幕公式化的行动，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简单化、程式化的图景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内容。最明显也最直接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化人为何在自杀和被杀前会有高呼“万岁”的行为？是不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使中国人“呼万岁”的习惯变成了文化基因？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正是他们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的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真的由衷爱戴这位“文革”的始作俑者，以致除了以“呼万岁”的这样的方式，无以表达自己卑微、虔敬的崇拜之情？抑或这些曾经极为发达的头脑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锐利的批判之锋，除了阿谀、谄媚外没有其他方式表明自己的“忠诚”？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章氏作为亲历文革灾难的人，对“文革”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直感的把握。她所指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这些自然无不道理。但我认为，为子女后代着想的成分居多，明志的成分为少，抗议的意涵居多，和解的成分为少，诅咒的成分居多，服膺的成分为少。

对于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革”，读书人的“腹诽”自然不能形诸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我们不妨读一读一位大难不死的外来人的文字。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他被整得妻离子散之际路过天安门城楼时的怨愤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这虽是后来在稍微宽松的环境中写下的回忆文字，但无疑是受难者当时的真实心情。难道这种感受是丛维熙一人所独有的吗？

按理说，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常言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然而，在一个睥睨历代帝王、练就了炉火纯青权谋之术、威力无所不在的政治偶像的权威之下，就是死前的义愤之词，也会为子孙后代酿成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试看一例。萧乾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

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撒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很显然,像萧乾这样的文化人并非要与当权者表示“心的和解”。

读过《彭德怀自述》的人想必会记得:自庐山会议以后即已落难的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对待,专案组拷问彭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彭反问:你们为何不看看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当时毛在给彭的电报中确实积极肯定了“百团大战”,并问这样的战役能否再组织一两次,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但是,事过境迁,人事两非,难道骁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真不明白,现在正在置他于死地者是何许人耶?非也。然而他还是抬出毛的话来为自己力争,将他的话作为尚方宝剑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和文革中那些自杀的书生在遗书中写下的“万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彭毕竟是条血性汉子,几十年出生入死的经历早已使他不再惧怕死亡,加之他晚年已无家小,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敢于对拿药给他吃的医务人员怒吼:“我不吃毛泽东的药!”这是那些有家累的书生们所不及的。可见,无论是执政集团以外的软弱的书生,还是集团内曾握有重权的不同政见者,都不可能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与施虐者“和解”,更不用说真心向他靠拢或为他祝福。

然而,不和解的书生们在结束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时,竟然不得不为施难者表达形式上的祝福、祈祷,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显然,自杀行为的背后当然有传统儒士极为珍视的“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发生作用,是对一个巨大的恐怖机器做最后的无可选择的抵抗。但问题决非仅此于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任何公民(包括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都不能凌驾于其上、而必须服从其评判的公共评判制度,那么,文革中的文化人是否还会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向掌握最高权力的施难者摇尾乞怜,以至“三呼万岁”呢?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而不被实际的权力控制者所破坏呢?显然,除了大致均衡的政治力量,这种结构是无法维持的。这种政治力量体现为代表集团意志的政党,以及各政党可以凭借的权

力制衡的国家制度。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制衡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最初的理想如何具有民主倾向,其结局都无法克服其领袖的独裁,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领袖独裁的必然后果是,领袖个人在整个政治集团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以致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不得不为其所控制和摆布,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这一点在刘少奇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重要人物身上表明的最为明显。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到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然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中,宪法抵挡不了“红宝书”,这就是连这位国家主席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以肯定,刘少奇在蒙(下转69页)(上接78页)受屈辱及落难以后一定思考过,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他眼前的这种局面?他自己是否也曾为这个局面出过力?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鼓与呼而受到错误对待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提供保护?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实际上,政治领袖在政权建立后走向独裁,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夺取政权前整个集团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压力使政治领袖还不敢过分独断,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内部的分裂。然而,政权建立后使政治领袖自我约束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如不对其权力及时加以限制,必然造成领袖的专制独裁。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一旦领袖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政治集团之上,形成个人独裁局面,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集团规章都将化为乌有。这个过程,套用文革时期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领袖走向独裁、成为整个政



# 我的老师陈白尘

● 董健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陈老一生的最后16年(1978—94)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但他对戏剧以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影响和贡献,却不限于南京和江苏,而是全国性的。在我国百年话剧史上,如果要推出10名剧作家作为优秀代表,我想是不会缺了陈白尘的。他早在1940年代参与中华剧艺社的领导工作时,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吴祖光说他“有治世之才”。但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做了一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陈白尘对有“官瘾”的人,尤其对“官瘾”大的文化人,特别反感。他女儿陈虹告诉我,解放初他见到一位阔别多年的文人朋友,其人艳羡官位之情溢于言表,总是打听你官位几级云云,令他十分不快,从此与之少有交往。早在30年代,陈白尘就以《金田村》、《大渡河》这样扎实的历史剧和《小魏的江山》这样题材、风格独特的小说而登上文坛。在抗日时期,他又开辟了我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显然,这与他强烈的“刺官意识”有很大关系。虽然并非凡官皆坏,但官与权力是一体的,在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不可否认,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难免叫人变坏,为官害民也就必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陈白尘的“刺官意识”就具有了合理性与正义性。陈白尘的喜剧多为刺官之作。解放前,他善于以喜剧之“笑”,对专制而又腐

败的国民党官僚政治进行暴露和批判。他的话剧《禁止小便》(又名《等因奉此》)、《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电影《天官赐福》等,其强烈的喜剧性大都来自刺官。这些作品不仅在1940年代曾轰动全国,解放以后也仍然被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欢迎。就说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升官图》吧,记得1988年陈白尘80华诞、1997年话剧90周年纪念时,南京都演出过这部喜剧经典。看着舞台上贪官污吏群魔乱舞,联系到现实中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无不为剧中饱含着批判之力的讽刺引发的笑声所震撼。我记得1988年那次演出,陈老曾登台演讲。一贯面带幽默微笑的他,那晚十分严肃和沉重,他说:“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败之风,我这个戏也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希望《升官图》这样的戏以后会丧失演出的现实意义!”我从现场的热烈反应和响亮的掌声中,感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所寄予的厚望。到1997年那一次演出时,陈老已不在世。那天晚上,我在《升官图》所引发的笑声过后,心情无比沉重,因为我想起了陈老那句尚未实现的话——此剧“演出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因社会腐败的加重而更加引人注目了。同时,我也想到,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讽刺喜剧将是人民大众所非常需要的,可惜当前的剧作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陈白尘那样敢于面对丑恶大笑一声的智慧和勇气。

2004年我写过一篇《白尘仙逝十年祭》(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5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强调了我的两点“发现”:一是陈白尘从他伟大的“喜剧精神”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治集团本身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政治集团内部的个人将无法以制度来维护个人权利,而处在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民,则必然沦为独裁者手中随意扭

捏的玩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可怜兮兮的书生除了五体投地,三呼“万岁”,表达形式上的忠诚外,还能有何作为? (责任编辑 萧 徐)



1994年陈白尘(左)董健摄于陈家客厅

义,一是陈白尘重续了文学与大学的因缘,对重振“大学之魂”功不可没。当今天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提起陈老,我不禁又想起这两点。陈白尘喜剧精神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也可以说,他通过喜剧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属于人民的“自由的笑声”,这种笑声反映了专制社会人民大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精神层面上的“笑”,是人类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压迫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精神的表现。因此,专制者不喜欢这种“笑”,甚至非常害怕这种“笑”。所以,能够容忍这种“笑”,进而从美学上喜欢它、欣赏它,也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1949——1979年之间,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戏剧史上真正喜剧的笑声很少见,而被代之以假、大、空,阿世媚上的“伪笑”(如某些所谓“歌颂性喜剧”) ?就是因为极左政治的专制主义扼杀了自由的笑声。而现在文娛市场上流行的那些笑星大腕的“搞笑”,在我看来也大都与真正的喜剧精神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在“权”与“钱”的压力之下,挺不起腰杆儿。可是陈白尘的腰杆儿是硬的,他终于从反专制、刺官僚的政治讽刺喜剧的创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占有核心的、关键的地位。但我最近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现,国内某些研究专家似乎仍然沉睡在极左的迷梦之中。他们口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那一套,回避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尊严的问题,歪曲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继续贩卖“反修防修”的荒谬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相去何止万里!《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曾几何时,由“反修防修”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文革”,却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

实现。这个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颠倒,并非在“文革”中突然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看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对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与歪曲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真正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良知”面对社会、人心的真相,忠于艺术的使命和规律,他们不会照理论骗子的框框去创作。陈白尘并非先有一个“政治前提”,再按照耳提面命去选择什么“主义”,他恰恰是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喜剧创作,表达自己的自由精神,表达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喜剧创作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个“左”与当今那些新老“左爷”的“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则是歪曲、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其主要手法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与封闭的专制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在“文革”中已暴露无遗。

陈白尘的喜剧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升官图》1946年首演时,面对着黑暗政治的阻力,陈白尘说:“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陈白尘文集》第8卷第3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腐败社会的“官场”,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其最后一幕戏演的必然是马克思说的那种沐猴而冠、出乖弄丑的“喜剧”,登台的官儿们必然是“丑角”,人类借此“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人们都

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陈白尘的喜剧正是这样,它发挥着打假求真、斩妖伏魔、从精神上把腐朽丑恶的事物“送进坟墓”的作用。1949年后,他的喜剧精神遭到压抑,无佳作问世,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才得以重新献出“自由的笑声”,这从他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阿Q正传》就看得分明,其中对农民革命思想的剖析与批判,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致的。其长篇散文《云梦断忆》也同样以“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文革”专制主义的种种丑剧。这一切都与陈白尘不怕“左爷”邪说、坚信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说到陈老在当代大学发挥的作用,很多人都估计不足。本来在“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二者都是在以民主、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的。文学要能提供照人前进的“灯光”,她必然要与大学结成精神的同盟。事实上找不出哪个现代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曾任教于大学的。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也不少,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熊佛西、陈白尘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境界,创造的精神——这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看一个国家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当然首先要从大学着眼。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就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最高权位上的皇帝也不敢自作主张,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可惜建国之后,在极左政治路线下,大学、文学均被改造为政治工具,大学失去独立研究学术的自由空间,文学则在“工农兵方向”下,背离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二者密不可分的好传统被丢弃了,二者在“文革”中同时遭到摧残。当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上边要陈老回京做官,但他却毅然接受了老校长匡亚明的聘任,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大学的这16年,他不仅继续创作了剧本《大风歌》、《阿Q正传》,散文《云梦断忆》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重建了南大的戏剧学

学科,培养了优秀人才。北京的李龙云、南京的姚远、上海的赵耀民,这三位全国著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剧作家,均为陈老在南大教出的戏剧学研究生。学者型戏剧批评家胡星亮、陆炜也出自陈门。这些,人们都看到了。但被忽视的是,陈老晚年作为教育家在重建那个被丢弃的文学、大学同根同源、二体一命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是:独立、自由、创新。

最近几年,人们才注意到“大学精神”问题,而陈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记得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重提“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这一多年被左倾教条主义置之脑后并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显然,这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粗暴批评和武断否定。随后,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胡批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正面教材纳入大学教学中。但陈老依靠大学的学术优势,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接受政治偏见和行政命令。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苏州开会研究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编写问题,陈老把北京、上海的夏衍、葛一虹、柯灵、赵铭彝等请来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学与文学结盟的学术会议。夏衍谈了一些“背景材料”,对胡文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分析十分深刻,指出周文虽有不足之处,但在“人学”问题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老所持观点大致与夏公同。这使我们的教材没因“紧跟”政治而短命,从1989年出版至今近20年仍被采用,几次重印,而且为纪念话剧百年即将出修订版,1992年还得到过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从苏州回到南京大学,我们坚持不在学生中贯彻行政上、报刊上那些宣传胡文、批判周文的种种“说法”。陈老说:“要读马恩原著,胡文周文都要研究,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话是23年前说的,那时大学里还没有重新提起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呢!现在听说有些大学在文科评出了颇受优厚待遇的“资深教授”,我看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授才够格,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

• 易 非

今年8月24日,我从报上看到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萧克将军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

我虽然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但他过去率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加拿大是我国友好邻邦。1970年建交后,两国人民和两军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出任我国驻加拿大使馆武官时,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不止一次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毛主席提出的鱼水般的军民关系为世界军事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副总参谋长特里奥中将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位负责的成员”。

1980年8月,我国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同志率领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美,使馆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国内提出萧克将军访美后,回国时顺道访加,加驻中国使馆也有这个要求,那时国内虽然外汇困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使馆的意见。

萧副部长访加消息传出后,加军方朋友十分重视,在外交交际场合上,不断有人询问萧克将军的情况。我们告诉加方朋友,萧副部长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我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政府派这样的重要人物访问加拿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如何重视中加两国军队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0年8月下旬,萧副部长率代表团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受到加军方派出的代表热烈欢迎。

当天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即予接见,双方谈话亲切友好。谈话中,威瑟斯上将询问萧副部长,加军通讯设备十分先进,法国军队都花巨款向加军购买通讯器材,中国人民解放

军如果需要,他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作出贡献。

对威瑟斯上将这一友好表示,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萧副部长问我如何答复对方的问题,我说是否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回去后考虑这个问题。”萧副部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向对方作了答复,对方点头表示理解。

随后,加国国防部长接见萧副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萧副部长在温哥华参观印第安人图腾

晚上,威瑟斯上将举行晚宴,热情欢迎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

威瑟斯上将在热情友好的欢迎词中,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阐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萧副部长在热情友好的答词中谈到白求恩时,加重语气说“随着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白求恩式的人物一定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总参谋部代表皮尔特将军全程陪同萧副部长参观。为了加强双方的交流,总参谋部在全军物色了一名少校中文译员,协助皮尔特将军工作。

这名中文译员是中国人,姓胡,早年随父辈来到加拿大谋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加海军工作,颇得领导欣赏。他对新中国态度友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蒙特利尔飞机制造厂、多伦多国防大学、多伦多参谋指挥学院、温哥华附近的工程兵学院和该学院举行的军事演习。

工程兵学院院长辛普生爱好高尔夫球,不久前因打球受伤在家休养,得知萧副部长要来参观他的学院后,不顾医生劝告,拄着拐杖随同萧副部长参观学院和军事演习。他动情地说萧副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前辈,是加拿大的贵宾,来到他的学院参观,是学院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伤口再痛也要出来陪同萧副部长参观访问。

萧副部长来加后,处处注意政治影响。王大使为了尽地主之谊,拟请他和代表团成员吃顿饭,他感谢王大使的深情厚谊,但他谢绝了王大使的宴请。他认为国家外汇困难,使馆应该尽量节俭,国内来客不应该宴请。加方虽然安排他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但他和副团长陶汉章都不习惯吃西餐,因此常常饿着肚子参观访问。我们拟向加方反映这一情况,希望主人能安排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在中餐馆就餐,他不同意。他强调访问一个国家应该客随主便,不应为主人添麻烦。王大使知道这一情况后,指示我们带上煤油炉、方便面再回房间“加餐”。

萧副部长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对我说,我党历史上的富田事件到底事实为何,值得进一步

研究。他问我加拿大华侨书店有无这方面的书籍?我很惭愧地说,我过去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以后我去书店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会派人去看。

萧副部长在多伦多访问结束时,加方总参谋部专门派了海军少将雅诺到多伦多设宴饯别。雅诺少将热情地反复强调,萧副部长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希望以后双方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中两国军队和人民的友谊,萧副部长答词中,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并感谢加军方热情友好地接待。到温哥华以后,皮尔特将军在中餐馆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回国,双方都频频举杯,为中加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皮尔特将军是第一次同中国高级军官同吃同住同参观,代表团成员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特别是萧副部长的风度仪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使加方朋友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

我不知道皮尔特怎么知道萧副部长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82年我回国休假时,他送了萧副部长一件纪念品,并向萧副部长索取《南昌起义》一书,萧副部长送了他一本,也送了我一本,并在两本书上签名留念。

胡少校通过亲身体会,对萧副部长和代表团更是推崇备至。

胡少校过去曾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知道我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民主精神好,但这些都是书上说的,印象不深。这次随代表团行动,通过观察体验和接触,深深感到我军高级领导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实在伟大,他对萧副部长印象最深的是对人热情友好,没有一点架子,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对待他就像对待皮尔特将军一样尊重。他说“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通过萧副部长的言行和影响,皮尔特将军和胡少校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和皮尔特将军每年还通过贺年卡互相祝贺节日。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革命老前辈驾鹤西去,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责任编辑 萧 徐)

#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

## ——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

### ● 资中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谈到我们自己，则忧心忡忡者少，基调乐观者多。也许经济形势本来就建立在公众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崩溃，就不可收拾，所以在宣传上保持信心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美国之忧衬托我们的“优”（越），从中得到安慰，则离现实太远。

在流行的种种论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国有化的思潮，其说辞之一是“美国不得不实行‘国有化’了，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混淆，是把政府救市等同于“国有化”，又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美国，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的误读。美国立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是遵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不会变的。但是至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过深刻的从观念到法规的改革，必要的政府干预早已被承认为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承认其有助于保护

公平的自由竞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硬要把自由市场经济说成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不是故意歪曲也是误解。方今之世，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的经济，特别是健全的市场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上的，而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政策法规，都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干预的力度、手段和时机是否恰当，是促进还是促退经济发展，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就美国而言，政府除了有多种法规监控企业外，在非常时期收购一部分企业也非自今始。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曾多次注资或收购煤矿、铁路、钢铁厂，乃至控股某些银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私人手中。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列举历史上诸多事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接管了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及军队的运输畅通，1920年又归还私人。二战期间，政府又接管了包括铁路、煤矿以及包括蒙哥马利百货连锁店等在内的几十家

公司。

上世纪30年代，亦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成立“金融复兴公司”，不仅给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购买了6千家银行的股份，高达13亿美元（略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股份陆续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据说政府基本上不赔不赚。

1952年，为配合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接管了88家钢铁厂，其理由是这些厂家资方的顽固态度可能触发大规模罢工，从而影响对韩战的供应。不过，不久，最高法院即判其违宪，滥用总统权力，此举未能持续下去。

1984年，伊利诺依大陆银行因石油贷款坏账濒于破产，里根政府收购了该行80%的股票，因为这家银行太大，担心其破产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为此，政府损失了10亿美元。后来这家银行并入美洲银行。

根据以上事例，美国百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政府“救市”之举。即使最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里根政府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干预的程度视需要而定，当前这一



次可能规模特别大,但是这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国有”,更谈不上“化”,一俟危机过去,就会恢复私有。正如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说:抛弃意识形态成见这样做,“目的是让资本主义的引擎充分发挥其生产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沉默的伙伴,有条件时就尽早抽身”,而不是颠覆资本主义,更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当年还是眼前,美国政府出资救市的每一笔钱,每一项法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国会反复论证,几经否决、修正而后通过。并且受到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的监控。其实实施的整个过程也在媒体监督之下。其中当然有利益集团的博弈,但难有暗箱操作。

至于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走什么道路,有赖于我们自己面对现实,对症下药。这里涉及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这个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从改革开放算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始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子之教,言简意赅。但是在现实中,我所见到的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外来经验,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强调国情特殊,拒斥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和与此相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一方面,又目光离不开美国,处处攀比,学校则“中国的哈佛”、富豪则“中国的洛克菲勒”、甚至丑闻都称“XX门”、特别是有关负面的事物,常见的说法是“连美国亦如此”,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或者减轻了严重性。例如腐败,例如

两极分化,既然美国也有,彼此彼此,倒说明是普世性的了,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又如我国自我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国有”被认为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掌握国家命脉的国营垄断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某些 CEO 的年薪却早已在绝对数字上赶上资本主义的美国,并以“国际标准”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却无视我国职工平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而且全民社保远远不逮的基本国情。在标榜“与国际接轨”时只攀比一头,另一头则强调“国情”。殊不知,美国私企高管的超高收入早已作为一种社会病灶为众所诟病,特别是破产企业高管正在受到公众谴责、国会问责。事实上,美国在 1960 年代,大企业高管的收入只有普通工人(按小时计工资)的 25 倍,到世纪之交猛增至 400 多倍,以后又急剧上升。其原因正是由于其收入中股份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也越来越致力于上下其手抬高股价,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实体业绩,以至于一些知名大企业出售股票的收入大于出售其产品的收入。股市日益与企业效益脱节,与此同时普通职工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股市泡沫的由来,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我国掌握“公有”资产大权者把“轨”接到了这一“国际”上,焉能不使国民受其害?诸如此类,弃精华而取糟粕,成为通病。

现在美国的确出了大问题,害了重病。全世界都在为它把脉。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底子

比较厚,实体经济仍然有一定实力,而且还有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这一机制是植根于制度文化中的、综合性的。至于在这次危机中它是否需要更新,将如何起作用,美国何时方能走出困境,世人将拭目以待。窃以为,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危险性远比不上 1929 年的大萧条。那一次正因其“史无前例”,全民没有准备,确实恐慌,相当一部分人丧失对制度的根本信心。自那时以来,实际上已历经多次波折。就失业率而言,里根时期曾达到过两位数,现在还没有达到。当然,那一次情况不同,是信奉供应学派的决策者鉴于自小罗斯福以来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积弊,以“壮士断臂”的决心主动采取反向措施所致。美国政治的特色是钟摆左右摇摆,在摇摆中进行调节。现在放任过度,监管不力,又需要摆向另一头了。与 20 世纪 30 年代相比,一个基本的区别是现在已经有了保底的社会保障,尽管还不完善,同时政府干预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反响较大是因为当年的大萧条只涉及欧洲,而如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其影响。我国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已相当紧密,受其牵连自不可避免。但是从根本上讲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本身的机制问题,改革走到这一步,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跨出新的一步。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积累的问题也必须解决。在这里倒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中国特色”

——自己的病根何在。

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目标是公平，各种所有制和经营管理机制只是手段。名义上的“公有”不一定能达到“公平”。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采取的正好是与美国当前相反的措施：为民营经济松绑，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和创新，同时

减少号称“公有”制的国营垄断企业的特权，加大对其监管的力度，将之置于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与公众监督，权力退出市场，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的是全面配套的改革，而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如果见到美国目前的政府举动，就说：你

看，美国也不得不国有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还是我们原来的老法子好，飘飘然陶醉于“中国拯救美国，乃至世界”之幻觉中，沿着这一思路而行必将导向饮鸩止渴，把改革拉向倒退，那是误国殃民之下策，万不可取。

(责任编辑 萧 徐)

## 代购代邮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 费  |
|--------------------------|--------------|-------|------|
| 国史札记                     | 林蕴辉          | 40.00 | 7.00 |
| 夹边沟记事                    | 杨显惠          | 34.00 | 7.00 |
| 沉思录                      |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 20.00 | 5.00 |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 沈宝祥          | 39.80 | 8.00 |
|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2.00 | 6.00 |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 傅国涌          | 30.00 | 6.00 |
|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 赵 诚          | 28.00 | 6.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5.00 |
|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 闫健编          | 35.00 | 6.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锐著          | 22.80 | 6.00 |
|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              |       |      |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 于光远          | 36.00 | 7.00 |
|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              |       |      |
|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              | 26.00 | 6.00 |
|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 王光美 刘源等      | 20.00 | 6.00 |
|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 陈大斌          | 38.00 | 7.00 |
|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张广友          | 32.00 | 7.00 |
|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 张纯如          | 28.00 | 6.00 |
| 张国焘传                     | 姚金果 苏 杭      | 39.80 | 7.00 |
|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 邢同义          | 24.80 | 6.00 |
|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 张 胜          | 45.00 | 7.00 |
|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 徐庆全          | 24.00 | 6.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 马识途          | 38.00 | 7.00 |
|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 冯建辉          | 29.80 | 6.00 |
|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 张素华          | 28.00 | 7.00 |
|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 下)  | 张树德          | 69.80 | 8.00 |
| 1958—1962 年的中国知识界        | 罗平汉          | 32.00 | 7.00 |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作者以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回顾、梳理、剖析了 30 年前那场纷繁复杂的大讨论，史料扎实可信，并有几十幅一手照片，对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正本清源，有重要作用。

《走出个人崇拜》 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夹边沟记事》 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讲述了大饥荒中发生的故事。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何处。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1949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显现在读者面前。

《李锐反“左”文选》 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2009年2月11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会议由徐孔主持，杜端正、吴思同志介绍了杂志社的情况。

本社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来宾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丁东 | 方海 | 王强 | 王也 | 王建 | 王俊 |
| 春瑜 | 海光 | 强振 | 冯健 | 冯瑞 | 关山 |
| 刘玉 | 志明 | 孙方 | 冯良 | 兰厚 | 纪希 |
| 许俊 | 齐昌 | 何方 | 朱凌 | 冯泽 | 吴象 |
| 宋群 | 张鸣 | 张来 | 何彬 | 朱椿 | 张思 |
| 张石 | 张森 | 张卿 | 李文 | 张宏 | 李普 |
| 李焱 | 张培 | 李忠 | 李乔 | 李锐 | 李维 |
| 杜光 | 杜润 | 李天 | 杨宇 | 李耐 | 谷秀 |
| 辛陵 | 邵燕 | 季音 | 林剑 | 苏双 | 郎福 |
| 郑笑 | 金雁 | 姚监 | 施亮 | 林耀 | 郝怀 |
| 钟沛 | 展江 | 殷毅 | 秦晖 | 赵准 | 郝中 |
| 郭道 | 顾骧 | 钱治 | 高放 | 袁卫 | 资源 |
| 梁衡 | 章立 | 章和 | 阎长 | 崔彭 | 曹彦 |
| 蒋彦 | 谢恒 | 章鲁 | 詹小 | 彭雷 | 曾煌 |
| 魏久 |    |    |    |    |    |
| 明  |    |    |    |    |    |

杜润生、李锐、朱厚泽等20位同志先后发言。



杜润生



李锐



朱厚泽



张文彬



吴象



张思之



邵燕祥



章诒和



金雁



李大同



展江



资中筠



崔卫平



杜光



孙振



蒋彦永



姚监复



戴煌



阎长贵



曹思源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再说“孙大午案”**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